

歷史制度論觀點的墨西哥農村再生與觀光： 「魔幻農村計畫」*

徐胤承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楊名豪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擬以「歷史制度論」嘗試回答以下的研究課題：「墨西哥的觀光導向農村再生模式為何形成？其中又有何特殊之處？」繼則闡述：就行動者來說，由於該國政府在歷史進程上長期以國家之力主導旅遊業，並爭取全方位地提升旅遊吸引力，包括從無到有，打造類似阿卡普爾科（西班牙文：Acapulco）與坎昆（西班牙文：Cancún）經驗的新興城市，故能在全

* 本文最初草稿來自兩位作者於111年執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今行政院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之創新研究計畫「農村再生與文化資產共舞－墨西哥魔幻農村視角下的我國農村旅遊」結案報告，該報告一部分內容亦經本文第一作者以「休閒農業與鄉村旅遊之思考」為名，口頭發表於第十四屆發展研究年會（111）。嗣後，歷經第一作者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科會）補助計畫「墨西哥權利救濟制度之法制史探索」（編號：112-2410-H-019-016-MY3）期間，基於對墨西哥更深刻的歷史脈絡理解，專就創新研究計畫結案報告中有關墨國部分改寫成當前論文。本文作者特別感謝所有匿名審查委員的建議，對於聚焦並完善本文有莫大幫助；此外，第一作者參與之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海洋史學術研究群」（編號：110-2420-H-002-003-MY3-GB11110，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盧正恒老師召集）讀書會，對於提升歷史思維深度，並在原始版本上重新規劃本文有莫大幫助。謹此對以上機構與提供卓見人員的支持及襄贊，一併致上最高敬意，用申謝忱。

球觀光體系內，扮演著旅遊舞臺的鋪設者角色，進而廣受世人矚目，無形之中致使所謂「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於焉產生。嗣再迎來接受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思潮洗禮以降的結構改變，使該國雖賡續仰賴以旅遊充做解決城鄉差距問題的攻略手段，但嘗試依循去中心化治理模式，進一步形成新的觀光政策。此後該國農村功能逐漸朝向多樣化演化，除不再單純具生產糧食作用外，反倒將重點置放於提供北美國家的入境觀光平臺，而且持續維持後者穩定成長的動機，甚至大於針對前者的需求。最後，歷經國家主導旅遊產業發展，以及新自由主義去中心化觀光政策磨合的墨西哥，造就了獨樹一格的「魔幻農村計畫」（西班牙文：pueblos mágicos），可謂其來有自。

關鍵詞：歷史制度論、觀光政策、墨西哥、農村再生、地方創生

* * *

壹、緒論

自工業革命後，多數國家產業型態從農業轉向工商業蛻變，影響所及，農村不再是提供主要就業機會的場域，於是大量青壯勞力趨往都市集中，最終造成偏鄉人口外移及高齡化等嚴重問題。普遍來說，雖然全球面對的現象相當類似，但各國多有不同因應手段，例如，以吸引人口回流非都市區域為主要政策目標的日本，以「地方創生」政策聞名，而根據增田寬也（2014）、吉田雅彥（2021, 27）等的說法，「地方創生」一詞的出現來自於「地域活性化」理論，同時含有社會復興與經濟復興的意涵（李長晏 2023, 7）。而在我國部分，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於2001年輔導推動「社區總體營造」，¹繼之而成後續行政院主政的「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的「新故鄉社區營造

¹ 詳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輔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社區文化再造計畫實施要點。

計畫」；²之後相關政策與措施的主要推動者，再從文建會移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即今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賡續辦理。由於前述之權責機關改變，故而名稱也多半由「社區」變成「農村」，³嗣於2010年間公告施行「農村再生條例」，運用「農村再生培根計畫」為執行手段，針對各農村社區特性及需求，開設培訓課程，期能培育足數供應農村發展的專業人力。

以上這些吸引人口回流的政策，大多著重在嘗試全方位的提升農村生活品質，即居住吸引力；除此之外，增加農村收入，通常也是併行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最常見的增加收入途徑，便是廣開觀光能見度，即提倡農村旅遊。例如我國「農村再生條例」第三章「農村文化及特色」，主要目標乃是針對農村社區具有歷史或特色建築物之維護與修繕補助，以及強化農村當地農業特色、景觀生態等資源，以利觀光發展。由於農村旅遊係一種利用當地環境與文化，提供旅客觀光體驗的良質旅遊模式，如能在發展之餘，兼顧並維持原本的在地生態與文化保存，則就這方面來看，無疑是最符合農村再生原則的產業之一（鄭心儀 2005, 148-181）。

但以我國而言，觀光做為三級產業，僅係推動農村再生諸多相關政策的輔助手段之一，農村的主要產業仍定調為一級產業；與此同時，另外有些國家，例如本研究標的——墨西哥，卻以觀光業主導農村再生政策，甚至不排斥農村放棄一級產業，並轉型成三級產業，其中緣由，頗值得吾人探究。惟觀諸目前文獻，雖然有許多討論我國休閒農業者，卻甚少見諸報告論述日本與德國以外的他國案例。⁴此外，迄今未有討論一國發展農村觀光前提的專文：即以政策

² 詳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九十四年度新故鄉地區營造計畫作業要點。

³ 惟於111年起，文化部似乎嘗試再度推動社區營造政策，即「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預計執行至116年，至其後續發展成果，則頗值得觀察。詳參文化部「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111-116年）」網頁，<https://www.moc.gov.tw/cp.aspx?n=128>。

⁴ 日本研究如文內所言，聚焦在該國地方創生政策，文獻之量極大，累積相當豐富的成果，從政策背景、理論基礎到實踐模式皆有深入探討，主要係基於一些學者與實務界人士所提出的論點，例如：增田寬也（2014）提出「地方消滅」論述引發廣泛討論，山下祐介（2014）則對此提出批判性分析；小田切德美（2014）與藤山浩（2015）分別從「農村振興」及「田園回歸」角度提出對策，而田中輝美（2017）進一步發展「關係人口」概念，超越傳統定住與交流的二元框架；木下齊（2016）及松永桂子（2015）則著重於地方經濟自立與新型生活方式的結合。至於德國研究部分，除少數

選擇而論，為何有些國家定調推廣非一級產業，資以增加農村收入的大方向主導農村再生；而另一些國家卻以提升整體環境，藉以吸引人口回流為選項？誠然，本文礙於篇幅，無法完整回答此大哉問，但仍可嘗試引介並分析取用前者做為推動農村再生手段選項的國家：墨西哥，進而提出該國的農村再生特殊模式。

緣此，本文嘗試以「歷史制度論」回答以下的研究課題：「墨西哥的觀光導向農村再生模式為何形成？其中又有何特殊之處？」而在文章架構方面，本文首先介紹「歷史制度論」，並以「行動者」與「結構」做為標的，分別撰寫分析所得。鑒於觀光業乃是一種能夠賺取外匯的行業，故而在其萌生初期，有心汲汲營營的前瞻行動者（墨西哥政府），就選擇以國家之力主導相關政策，而受此影響下，無形之中逐漸形成路徑依賴；至於結構層面的考量，則在該國接受新自由主義思潮洗禮後，即令農村不得不進行轉型實踐，以期維持生存發展，並依循去中心化治理模式，進一步形成新的觀光政策。本文亦指出，墨西哥農村具雙重功能，分別為農業生產取向，以及提供外國觀光客旅遊平臺；而在面對「新農村」現象產生後，農村承擔農業生產的功能大幅下降，因此墨西哥政府在路徑依賴下，自然傾向以觀光主導農村再生，俾能突破當下困境，重現城鄉榮景。最後，本文擬就「魔幻農村」⁵計畫加以說明評述，並兼及部分負面批判意見，以供有興趣的讀者參究。

貳、墨西哥觀光主導農村發展模式生成：歷史制度論的分析

所謂「歷史制度論」，乃「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的分支之一，而新制度主義則是針對政治學「行為主義」（behaviorism）的反思主

學者外，更多在於我國主管機關所關注的該國「我們的農村有未來」（德文：Unser Dorf hat Zukunft）競賽，並曾多次派員考察（陳育偉 2007）。

⁵ 「魔幻農村」（西班牙文：Pueblos Mágicos）組成的單字中，“mágicos”可以翻譯為魔幻、魔法、奇幻、神奇等，而“pueblos”泛指農村、小鎮及鄉村，也就是說，中文翻譯上容許多種組合；事實上，坊間較為常見的翻譯其實是「魔幻小鎮」，但如翻譯成小鎮，則無法顯現其背後蘊含的農業發展與農地使用等議題，因此本文不採。

張。蓋以行為主義源於1930年代，曾因批判靜態的傳統制度論而名噪一時，由於前者認為人類的行為可以預測，因而社會科學自有可能採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即以中立價值取向的實證（empirical）研究方法，用以建構理論（Sanders 2002, 45）。故自行為主義竄起後，逐漸形成研究方法論的主流，直到80年代，方出現一些學者對其進行反思（胡婉玲 2001, 87），例如March與Olsen（1984）等，裨補闕漏。

新制度論者認為制度具有自主性，並非只是行為者的中立舞臺，希望「重新尋回國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Immergut 1998, 5），並修正過往偏於靜態的制度論，改採較為動態的研究方法，不過之後隨著各家求解的視角不同，以致形成諸多分支流派，⁶其中以歷史角度切入者，一般稱為歷史制度論，首度引起學術界關注，則係出於《建構政治：比較分析中的歷史制度主義》（*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Steinmo, Thelen, and Longstreth 1992）一書，按該理論著重歷史過程，諸如正式或非正式的規則、規範、行為準則等等與政策相應的關係，皆其強調或介入的範疇，而且特別關注其中的「變」（change）——即歷史事件對於制度的非預期重大影響，以及「常」（continuity）——即制度被歷史事件推往某種方向產生的「路徑依賴」，⁷設若深入探索，堪認條分縷析清晰易懂。

「路徑依賴」概念通常用來描述發展的軌跡，即一旦政策確定，對相同方向的進一步移動，勢將自我強化（self-reinforcing）該路徑，因為正向回饋（positive feedback）既增加了趨往特定方向的利益——此節或稱之為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David 1985, 335），同時亦提高了切換到其他不同方向的政策成本（North 1990; Pierson 2000）；因此，主政者看似尚能自由選擇

⁶ 此處不多深究相關流派的分支數量，但其常見的分類，大抵不出歷史制度論、理性選擇制度論（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及社會制度論（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等三大主張（Hall and Taylor 1998, 958-962）。

⁷ 鑒於本文屬於個案研究，需要花費大量篇幅描述墨西哥，故礙於字數限制，僅能針對歷史制度論相關文獻簡要回顧，如欲深入探究該理論，建議參閱國外學者相關著作，例如North（1990）、Pierson（2000）及Mahoney（2001）等人的闡述；至於國內整編出刊的中文文獻，則包括黃宗昊（2010）、蔡相廷（2010）及李天申（2020）等人發表的宏論，內容皆十分詳實。

手段，但實質上（或於潛意識內）早已優先考慮某些特定選項而排除其他備選部分。

綜上，依據Mahoney（2001）的說法，路徑依賴的架構可以分為5期，首先第1期「前期條件」（*antecedent conditions*），乃定義「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的先前歷史條件。其次第2期「關鍵時刻」，意指行動者可從兩個或更多的替代方案中，選擇一個特定的選項；此處應補充說明的是，關鍵時刻的特點，著重於結構性（即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組織等內涵）對政治行動的影響，但如該影響力在相對短的時期內明顯減弱，則強大的政治行為者所面臨的合理選擇範圍，勢必巨幅擴大，換句話說，就本課題而言，突發的偶然性，可能變得至關重要（Capoccia and Kelemen 2007, 343）。再者第3期「結構的延續性」（*structural persistence*），即制度創設後，有其頑固性而持續存在。至於第4期「反應序列」（*reactive sequence*），則是行動者對現有框架，通過一系列可預測的反應與對抗。最後第5期「結果」（*outcome*），即反應的疊加或累積，勢將引導未來的發展途徑，並投射到最終的結論。

下文嘗試以歷史制度論的「路徑依賴」為中心，就其結構與行動者兩大因素，分析墨西哥觀光業的崛起與茁壯，以及為何將農村再生寄託於斯。

一、行動者因素

本文研討的所謂「行動者」，指的是墨西哥政府；而藉由觀察歷史當下行動者的決定，以及其所造成的後續路徑依賴，應能了解該國甫一開始選擇以國家之力，由上而下推動主導觀光政策的模式，接續過渡到於接受新自由主義思潮洗禮後，嘗試轉換成為由下而上發展觀光的政策變化。

（一）國家之力主導觀光政策的緣起

若談及墨西哥如何以國家之力主導觀光政策，則不得不先了解所謂「主導」與「介入」的區別。嚴格來說，世界上幾乎沒有國家不介入觀光政策；或者說，除了因為特殊意識形態而鎖國的少數國家以外，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主政者，都是旅遊政策的干預者（Izard et al. 2010）。根據Kubickova（2016, 74）的研究，各國政府積極介入旅遊業發展的主要原因，在於旅遊業本質中存在搭便車（*free rides*）現象；也就是一國觀光發展成功的前提，往往取

決於旅遊業本身以外的優質公共財，例如優美的風景、豐富的文化、和善的人民、漫長的歷史、便利的交通等。如國家撒手不理，僅單靠旅遊業私營部門，則幾乎不可能將原本窳陋的公共財，轉變改爲良善堪用者，並進一步維持或保存；質言之，唯有政府方擁有必要的合法權力及支持力度，包括協調（coordination）、規劃（planning）、立法（legislation）、監管（regulation）、企業刺激（entrepreneur stimulation）等手段，以及扮演社會旅遊角色（a social tourism role）與更廣泛的保護利益角色（a broader role of interest protection），俾能全方位地創造有利於旅遊業競爭的大環境（Devine and Devine 2011, 1254）。除此之外，政府甚至能反向操作，即遊客過多時，承擔入場控管並防止爆量的責任（Quintana 2016, 727）。

即使世界各國幾乎皆有介入觀光發展情形，但吾人仍能察覺彼等之間的干預程度不一。Jenkins與Henry（1982）將政府區分爲被動參與（passive involvement）與積極參與（active involvement）兩大類別，前者指的是推出一些有利於發展旅遊的法律與政策，例如獎勵投資，但並不針對旅遊業本身的成長展開積極作爲；至於後者，指的是承認旅遊部門的需求，並主導之（Jenkins and Henry 1982, 501-503）。一般來說，開發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y）的旅遊業，常被視爲主要的收入來源，而與已開發國家（developed country）的旅遊業相比，後者對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貢獻度較低（Kubickova 2016, 78）。由於旅遊業對開發中國家GDP具有增磚添瓦的作用，故在意識形態准許開放旅遊市場的情況下，其中不少國家將旅遊業視爲拉抬經濟成長的重點，導致開發中國家干預旅遊業的程度，往往相對較高於已開發國家。

當然，前述只是一個表象觀察，並非定律或鐵則。事實上，並非所有開發中國家都以主導旅遊業爲選項，但如該些國家選擇投入旅遊業，則大致上會按照Hall（2008, 45）指出之二戰後（1945年）至今旅遊政策的演變過程，逐步進化轉型：1945至1955年，國際社會開始鬆綁海關、貨幣及衛生法規；1955至1970年，政府參與旅遊行銷；1970至1985年，政府主導修建旅遊基礎設施，並將其做爲區域發展的一種工具；1985至2000年，政府承繼前述工具作爲，但逐漸減少直接參與，反倒重視公私合作夥伴關係，以及強化行業自我

監管舉措；迨從2000年起，政府除延續前述工具作為外，更加傾注利於旅遊發展的網路文宣、環境保護及永續經營等新興議題。

墨西哥作為開發中國家，選擇以旅遊業做為經濟動能之一，甫一開始採用的即是幾乎悉由政府主導的觀光政策，特別在迎合美國觀光客方面。蓋自1917年墨西哥第三次立憲（該部憲法亦為現今頒行者）起，該國國家商會（西班牙文：Cámara Nacional de Comercio）部分成員為促進墨、美兩國關係，遂於1921年2月間向時任總統阿爾瓦羅·奧布雷貢（Álvaro Obregón）建策，擬議進行一趟名為「墨西哥聯合商會親善委員會訪問美國團」（Tour of the U.S. by the Good Will Committee of the Confederation of Mex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的美國之行（Mateos 2006），俟該團返國後，參與的企業家們產生一個共識，並作成結論，即為了提升遊客到訪墨西哥的吸引力，該國亟需擴大城市建設的軟硬體設施，其中與旅遊吸睛地區相連通的道路，亦包括在內（Mateos 2006, 34）。

1925年墨西哥與美國恢復外交關係，前者中央銀行旋於次（1926）年設立旅遊部門（西班牙文：Departamento de Turismo），復於1928年成立綜合旅遊委員會（西班牙文：Comisión Mixta Pro-Turismo, CMPT），邀集該國知名企業家及官方代表參與，共研如何擴增墨西哥的旅遊需求，資以激勵國內觀光產業持續成長，惟因旅遊可能涉及敏感的非非法移民問題，故而當時的委員會係由內政部（西班牙文：Secretaría de Gobernación）總攬全域。一年後的1929年，CMPT改組更名為國家旅遊委員會（西班牙文：Comisión Nacional de Turismo），嗣又持續運作至1934年，始再轉為隸屬於國家經濟部的旅遊部門（西班牙文：Departamento de Turismo dentro de la Secretaría de la Economía Nacional）（Mateos 2006, 37-38），於焉變嬗端緒初見。

與此同時，墨西哥政府部門也開啓與私部門積極合作的門扉，例如1925年，一間專門攝製明信片的公司（México Fotográfico）成立，其負責人與國會議員及政府官員交密，彼此互動不輟，官民之間不遺餘力地合作推廣觀光，除拍攝國內各州最具代表性的景觀元素外，並將影像製作成明信片出售，使得後者不僅能夠起到傳遞旅遊訊息的作用，還展示了墨西哥各地別具一格的自然、人文、史地及優美風光，藉此吸引外國遊客及投資者（Eguiluz 2011），而其

中一些典型且又特色鮮明的景點，嗣後也都構成了現今魔幻農村的部分枝幹結構。

此外，就在墨西哥決以舉國之力發展觀光時，剛好遇到一件有助於促成其後轉機的「偶發性歷史事件」（contingencies of history），即適逢美國長達13年的禁酒時期（Prohibition Era，起訖期間：1920年至1933年）⁸，促使大量的美國酒客湧入墨西哥北部城市的賭場及酒館，四處搜購食用酒品。在這樣的契機下，使得墨西哥政府及私人部門（包括政治家及企業家）皆積極回應觀光客，並將旅遊視為宣傳工具，除了藉以塑造社會穩定、歷史悠久，以及具有豐富多元的自然、人文、地理等形象之外，並呈現已能比肩世界、立足國際的現代化國家面貌。而經此操作後，終使該國的觀光產業突顯於外，成為刺激商業交流與工業發展的主要誘因及手段（Mateos 2006, 38）。

（二）國家主導觀光政策的巔峰：陽光沙灘旅遊

如前所述，墨西哥觀察到旅遊能做為賺取外匯，以及提升就業的手段後，便積極推廣並普及之，嗣後更以「陽光海灘旅遊」（西班牙文：el turismo de sol y playa）展現觀光賣點的獨特營運模式，著手規劃綜合旅遊中心（Mendoza, Hernández, and Villarreal 2009, 13）。按查該國實施類似計畫，最早可以溯及1940至1950年代的阿卡普爾科（西班牙文：Acapulco）；鑒於該地點位在格雷羅州（西班牙文：Guerrero）的海岸線上，景觀尤其美麗，墨西哥政府遂於20世紀中葉，通過一系列國際行銷政策，將其經營成全世界最吸睛的旅遊目的地之一。

迨至1958年間，墨西哥成立由時任總統米格爾·阿萊曼（Miguel Alemán）擔任主席的國家旅遊委員會（西班牙文：Consejo Nacional de

⁸ 事實上，早於1808年，美國紐約就有人組成「莫羅及諾森伯蘭聯合禁酒協會」（Union Temperance Society of Moreau and Northumberland），反對飲用烈性酒品，並抨擊因其而引發的公共混亂。不過接下來的數十年間，戒酒派雖曾成功在某些州立法限制酒類產銷，但未久又被解除禁令，可見該協會影響力並不穩定。直到1920年間，禁酒派聲勢達到最高峰，甚至促成《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十八修正案（*Eigh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通過立法，惟因該案宣告酒類釀造、運輸及銷售核屬違法的規定難以落實執行，最終於1933年遭到廢除（Aaron and Musto 1981, 127-181）。

Turismo），負責推廣墨西哥的國外旅遊事宜，並直接在海外廣設15個代表處，其中美國12個，加拿大2個，阿根廷1個（Muñoz and Herrera 2005, 207），是以能在隨後年代做出良多貢獻，應認有其作用。嗣後該委員會於1962年制定了旅遊發展計畫，主要目標為擴大全國道路網，一併優化並新建旅遊公共工程，以及研究、改造並修復考古遺址及歷史古蹟（Martínez 1993, 67-73）。與此同時，美國也出現大量的影視作品，它們將墨西哥誇讚為可以讓美國人逃離苦悶日常生活的理想旅遊勝地（Fuller 2014）；而如此美而化之的大肆宣染，更為墨西哥的觀光產業迎來春天。

在阿卡普爾科成功後，墨西哥於1970年代，萌生一個更迎合觀光客的大型實踐計畫：「坎昆」（西班牙文：Cancún，位在尤卡坦半島的金塔納羅奧州，西班牙文：Quintana Roo）；然因該首創之舉的成功，加以窮則思變的趨向所趨，造成墨西哥不斷嘗試複製貼上前揭經驗，形同是為該國善以觀光前導農村造鎮的路徑依賴，提供了正向回饋。

1960年代末期，時任墨西哥財政及公共信貸部（Secretaría de Hacienda y Crédito Público）部長的安東尼奧·奧爾蒂斯·梅納（西班牙文：Antonio Ortiz Mena），說服了總統古斯塔沃·迪亞斯·奧爾達斯（西班牙文：Gustavo Díaz Ordaz），開始建設坎昆（Espinosa-Coria 2013, 157）。事實上，形成坎昆發展的有利時機之一，同樣肇因於鄰近地區農業蕭條。回首20世紀60年代，當時墨西哥領土內的尤卡坦半島（西班牙文：Península de Yucatán）農村陷入嚴重困境，主因在於當地經濟的重要基礎——即龍舌蘭（西班牙文：henequén，英文為agave fourcroydes）的產銷出現重大危機；根據統計，1963年間當地僅僅依賴種植龍舌蘭為生者，即多達23萬8,000人（Espinosa-Coria 2013, 158），但受到其他國家成功培育同類新品種的影響，造成全球市場供給大幅暴增，因而導致尤卡坦半島大量農村人口失業，造成政府部門極為頭痛且亟待緩解的重大挑戰（Espinosa-Coria 2013, 157）。

其時在國際組織的支持下，為了促使墨西哥早日解決前揭難題，遂由功能類似世界銀行的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BID）出面，建議該國積極投入旅遊業，並將其視為概能促進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有效工具。其後，BID於1970年間，首次向墨西哥政府提供一筆貸款，金額

約為1,700萬美元，即是用於建設坎昆的綜合規畫中心（Espinosa-Coria 2013, 158）。

始於1970年間的坎昆建設工程，隨著時間推移，成為墨西哥政府推動旅遊業新政策的地標象徵：而一個原本幾乎無人居住的海岸地帶，歷經幾十年的滄海桑田，竟然蛻變為數百萬國內外遊客喜愛的觀光聖地，甚至當地蓬勃發展的旅遊業，還能提供為數眾多的工作機會，資以回饋鄉梓。此外，坎昆的國際機場於1973年啟用，其後客、貨運量逐年遞增，現今已是墨西哥的第二大流量機場。在此優勢下，坎昆不但被視為帶動所在金塔納羅奧州經濟起飛的引擎，且其活力更使該州的地理環境逐漸出現差異化，其中北部目前的繁榮程度，已與中、南部的成長滯後形成鮮明對比，即是顯例。其次，1998年間Benito Juárez市（坎昆乃其行政中心）的年均收入為8萬1,820墨西哥比索，而其他地區（譬如Lázaro Cárdenas與José María Morelos市）的年均收入則僅為2,340至3,800墨西哥比索不等（Espinosa-Coria 2013, 159）。再者，坎昆的人口不斷以令人瞠目結舌的速度加快流入數量：其中2010年間的Benito Juárez市，即有居民66萬1,176人，約占該州總人口的半數（INEGI 2010, 3），而此種敢把山河造，並且創出住民從無到有再至密集群居的都市化過程，使得往後試圖複製經驗、貼往他處之聲浪，更是此起彼落。

其後該國通過《聯邦旅遊促進法》（西班牙文：Ley Federal de Fomento al Turismo），並於1974年2月13日生效，據以成立國家旅遊基金（西班牙文：Fondo Nacional de Fomento al Turismo, FONATUR）；而該組織除了支持旅遊業的發展外，亦著重與農業及其他相關部門的協調配合，嗣於次（1975）年成立旅遊部，正式掛牌運作迄今（Mateos 2006, 40）。

至於前揭國家旅遊基金，則負責支應設計旅遊體驗的花費，以及策劃進行旅遊導向的造鎮計畫——「綜合規畫型旅遊中心」（西班牙文：Centros Turísticos Integralmente Planeados, CIPS）。而在坎昆之後，接著陸續進行的伊克斯塔帕（西班牙文：Ixtapa）、洛斯卡波斯（西班牙文：Los Cabos）、洛雷托（西班牙文：Loreto）及瓦圖爾科（西班牙文：Huatulco），亦皆是動見觀瞻的不凡之作（Mateos 2006, 40）。直到1999年，墨西哥政府始另創建旅遊部的輔助機構——墨西哥旅遊促進委員會（西班牙文：Consejo de Promoción

Turística de México），用以規劃國內與國際旅遊發展的整體戰略目的及戰術目標（Mateos 2006, 41）。

綜上，墨西哥政府作為行動者，逐漸萌生致力於推廣觀光業的動機，並在第三次制憲後，進一步總結相關建策，期間又因偶發性歷史事件（美國禁酒令）的推波助瀾，使得政策推行益加順暢，而不斷複製的成功經驗，導致路徑依賴於焉產生，使得各方資源宛如湧泉般，直往觀光業挹注投產。

（三）改變的關鍵時刻：新自由主義思潮

即使坎昆搭配旅遊的商業運轉模式極為成功，但1970年代在旅遊業以外的整體經濟架構上，墨西哥卻出現內外債務累增、生產力低下，以及出口能力不足等問題（Mendoza, Hernández, and Villarreal 2009, 13）。緣此，致使該國國內新一代政治菁英與專業學者，多對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ist statism，或稱developmental state）的未來前景抱持懷疑態度（O'Toole 2003, 269），以致逐漸出現疾呼加入自由市場的震耳之聲，而為了提高說服力，彼等引用於1950年代嶄露頭角的新自由主義哲學家彌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及弗瑞德呂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等人著作，充做反對發展型國家的理論武器（O'Toole 2003, 270）。

新自由主義做為一種思想，範圍很廣，實難僅以三言兩語即論述清楚，但它也可以說是一種世界觀或哲學（philosophy），一種政策話語（policy discourse），或是一種政策實踐（policy measures）（Castree 2010, 7-12）。借用Harvey的話說，新自由主義常被理解為一種政治經濟的實踐理論，依其主張，促進人類福祉的最佳方式，並非限制個人自由發展的能力及商業自由，而是建立一個由政府創設，且能以保障私有產權、維持強大市場功能，以及促成貿易自由為特徵的制度框架（Harvey 2007, 2）。因此，揆其原則大致包括：私有化、市場導向、放寬管制、商業或商品化、國家推動民間機制彌補自身缺陷或不足之處（去中心化），以及靈活運用市場工具等項（Fletcher 2019, 40）。

雖有前因加以鋪陳展現，然而甫一開始，墨西哥並未立刻採納新自由主義理念，而是在國內以各家爭鳴的形式醞釀之。但自1982年拉丁美洲債務危機後，接受國際金融秩序下的自由市場已經不可避免；而觀光遊憩做為全球最大

產業之一，旅遊政策的發展也是新自由主義主要影響範圍，甚至成為新自由主義傳播的關鍵途徑（Fletcher 2019, 37）。因此，當墨西哥政府面臨新自由主義思潮衝擊時，扮演制度行動者的國家角色，勢必需要跟進並妥為因應，因此，致使政府部門對於觀光政策的釐定，以及執行態度，隨之逐漸產生顯而易見的變化。

二、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結構因素改變

本文研討的所謂「結構」（structure），指的是以宏觀角度——例如國際關係、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層面，觀察歷史當下決策者所處的脈絡及其狀態；而在歷史制度論中，通常用以指出決策者的政策選項，實際上係受到宏觀結構的限縮影響。下文將指出，這些結構因素導致墨西哥政府在推動農村再生時（亦指行動者的實踐作為），最終不再考慮選擇以促進農業產業升級為目的之手段，而偏好操作他種對其最有利的方式。

（一）何謂農村？

進入本節討論之前，首先需要探討「農村」的定義，以及幾個容易混淆的類似名詞，包括小鎮、鄉村、社區、漁村等，皆是有待釐清者。鑒於前述名詞的表達方式，經常圍繞在日常生活用語中，但似乎又難以言明各自的具體意涵，而任人解讀之下，往往形成不確定性頗高的通俗詞彙。實際上，「農村」（特別強調農業的村莊）一詞似乎是中文語境中較常出現者，反觀英文或西班牙文用法，其中並無與之對應且能直接翻譯成「農村」的單字或語詞；雖說亦可勉強將「農村」轉譯成英文的“agricultural village”或西班牙文的“pueblo agrícola”，甚至是“peasant village”這種略帶歧視意味的字眼，但對於以當代英文或西班牙文為母語者而言，「農村」並不是一般慣用的說法。

既然如此，那麼當談及農村時，到底所指為何？理論上，常見有兩種方法界定之，一種是依照經濟活動而分類，建立在農業與非農業之間的劃分或區隔，即農村為大多數居民以農業為職業的聚落。而所謂「農業」，一般理解其為人類通過處理自然資源，產出初級食材或用品（譬如種植作物、水產養殖、畜牧養殖、木材生產等等）的傳統產業，有時也包括直接採集（譬如狩獵、捕撈、砍伐等等）自然資源的行業。

前揭分類，在20世紀初葉以前的社會科學中常見，因為當時的非都市區域多半以傳統農業活動為主，故而幾乎沒有其他產業升級可言，是以農村勞動力的主要作用，即是貢獻於糧食生產（Gómez-Pellón 2015, 1）。然而隨著時移勢易，現代農村的人員、商品、資訊及服務的流動性大增，導致農村經濟活動組成益趨離散，而且多半摻雜大量第二或第三級產業，例如加工業、觀光業、娛樂業、服務業等，皆屬之，致使彼此呈現相依共存的多元景氣。此外，由於農業容易受到季節影響，其中又以小農較難承受這種不穩定性，因此許多農村居民，一年四季所從事的職業各異，甚至出現類似逐水草而居的遷徙行為，即一年中的幾個月，留在某個地方過著傳統的農村生活，但在其他幾個月，則外移至另個地方成為當地住民。此外，部分定居城市者將農村環境做為他們的「第二居所」（西班牙文：residencia secundaria），俗稱「渡假屋」（holiday homes），即僅於假日或週末期間暫住農村地區。⁹一般來說，這些都市居民主要經濟活動與第一居所，自以城市為軸心，但基於休閒目的或思鄉因素（譬如出生於農村後移居都市），導致他們不定期地短住農村。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將農村視為第二居所的住民，也改變了農村地區的非農產業結構（Gómez-Pellón 2015, 9）；也就是說，許多農村居民已無法被簡化並歸類為傳統上所認知的農民。緣此，前述藉由農村與農業具有強相關的粗糙分類，逐漸開始變得不合時宜。

至於另一種分類法，則是從空間上區隔，按其係將人類定居點概分為都市與非都市，而後者都可泛稱為農村；譬如我國「農村再生條例」第3條第1項規範「一、農村社區：指非都市土地既有一定規模集居聚落及其鄰近因整體發展需要而納入之區域，其範圍包括原住民族地區」，而該條文所表明者，即是法律上針對農村定義的著例，惟鑒於其內部成員從事農業的比例並非重點，因

⁹ 擁有墨西哥農村第二居所者也可能係外國人（主要為北美人士），其產生原因有二：首先探討經濟因素，此觀北美嬰兒潮世代（baby boom）之後，為數不少者鑒於中南美洲國家物價便宜、生活成本偏低等利多誘因，故而考慮退休之後改在墨西哥或其他拉丁美洲國家買房定居，可見其影響脈絡；其次為地緣考量，此因墨西哥與美國南方接壤，氣候又偏暖和，故在吸引美國退休人士趨往或入住上，較諸他國更居優勢（Acosta and Lúgigo 2017, 498）。

此，我國所指的農村，實際語境就是「鄉村」，並以其通俗用語，概括描述傳統「非都市」的人類居住空間。當然，如此分類勢將產生另一個問題，即如何界定都市與非都市？設若依據行政院主計處訂定的「中華民國統計地區標準分類」（自民國99年12月25日起業已停止適用）定義，兩者之間主要依據人口規模劃分。然觀該種分類雖有所本，但前揭定義原是基於行政作業方便，而非本質上的界說探討；職是只要人口超過一定規模的居住地，是否皆得稱之為都市？恐怕未必，實際上似亦不宜如此簡化歸類。

綜上，到了21世紀，吾人很難找到一個村莊，裡面所有居民都從事傳統農業活動，而沒有導入其他產業；或者，即使不嚴格地定義農村為村莊全員皆從事農業者，而是採取從事農業的比例當成分水嶺，恐也難以決定適當的比例究竟應該定成若干。因而農村一詞，著實難以與農業形成精確連結，頂多只能認為冠上農村之稱者，其中或多或少存有農業生產人口；由此可見，農村與鄉村幾無實質差異。即使後文提到的墨西哥魔幻農村，雖然大多居民是以農業為主要生產者，但也並非全然如此。雖說以上分辨清晰可考，然而參酌我國多已約定俗成地使用農村替代鄉村，故在本文的論述中，並不特別區分農村、鄉村、小鎮、社區、漁村等相近名詞，而統以農村涵蓋之，用意乃為避免倘採量化標準界定都市與非都市，可能造成的甄別困擾。總之，本文僅採廣義的定義「農村即部分人口（不論多寡）從事農業，且其所在處所位於主要都市以外的人類居住地」，俾與所謂「都市」形成鮮明對比，繼而不致模糊對於農村的客觀認知。

（二）新農村結構：農村功能改變

哥倫布於15世紀末期發現新大陸，開啓地理大發現時代；其時西班牙帝國對印地安人的治理，係採用類似歐洲中古時期前的莊園制度，即西班牙征服者做為莊園主人，將印地安人視為領地內受支配的勞動力。¹⁰而這些勞動力或為礦工，或為農民，或為幫傭，不一而足；當然其中最主要的人資目的，還是需求量最大的礦工與農民。迨至殖民中後期，西班牙帝國又創建了類似於後文所稱的「村社」（西班牙文：Ejido）與「合作社」（西班牙文：Comunidad）

¹⁰ 對此研究議題有興趣之讀者，請詳參徐胤承（2023）。

單元，藉由分配印地安人土地，讓其自食其力（Morett-Sánchez, Carlos and Cosío-Ruiz 2017, 128）。繼至18世紀末葉，拉丁美洲獨立戰爭紛起，其中墨西哥於1810年宣布獨立，但戰禍（包括美墨交鋒與法墨之戰）隨之而來，以致國力持續不振。直到1876年間，波菲里奧·迪亞斯（西班牙文：Porfirio Díaz）就任墨西哥總統，嗣後展開數十年的個人獨裁統治，但其依舊無法有效解決國內土地資源集中在少數地主手上的民怨問題。既使來到20世紀初期，農地兼併嚴重仍是墨西哥面臨的主要難題之一，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僅僅不到1萬1,000個莊園，竟然控制著全國57%的領土，致使總數計有1,500萬農民（約占國內務農人口的95%）的農村家庭，皆無自有耕地（Ita 2006, 148-149）；最終巨大的貧富差距導致墨西哥革命（西班牙文：Revolución Mexicana）爆發，俟前揭迪亞斯政權被推翻後，主張重新分配土地的勝利方，遂於1917年2月重新制定憲法。¹¹

按該部憲法第27條規定「領土範圍內所有土地及水域的所有權，應屬國家，國家有權轉讓該所有權給私人，由此形成私有財產。國家在任何時候均有權根據公共利益的要求，對私有財產加以限制，並得為社會福利的目的，規定易被占用的自然資源之使用方式，達到公共財富平等分配與保值、國家平衡發展，以及改善城市及農村人口生活條件的目標」，係將墨西哥土地重新洗牌分配，其中除少數小塊面積的土地同意私人擁有外，其他地區（包括農村在內）的許多土地，皆被授予「村社」或「合作社」兩種功能相近的集體組織，且兩者都不擁有所分配土地的產權，而僅是使用權。不過值得一書的是，經由前揭法規明訂及具體運作結果，在接下來的80年裡，此一農地改革政策已將1.03億公頃的土地（約占墨西哥領土總面積的52%），分配給了350萬的農地與集體土地使用者（Ita 2006, 149），可見成效初具。

時序進入1980年間，墨西哥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衝擊，以致國內部分有識之士，為了是否加入全球自由貿易體系而激烈爭辯，起初墨西哥政府尚

¹¹ 值得注意的是，該部憲法針對平均地權的相關規範，應可認係墨西哥擁抱新自由主義後，又有所改變的另一個關鍵時刻，惟因此非本文討論農村再生的路徑依賴起點，故僅概略提及。

能擱置此議題，然而幾經討論，時任總統荷西·羅培茲·波提略（José López Portillo）雖稱將無限期推遲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Story 1982, 767-794），不過其後幾經波折，該國最終仍於1986年由繼任總統米格爾·德·拉·馬德里·烏爾塔多（Miguel de la Madrid Hurtado）宣布加入該組織。

爲此之故，墨西哥執政者特地修改憲法第27條，即希望資本化「村社」（Cornelius 1992），並希望消除小塊農田（西班牙文：minifundio），以期刺激對農村土地的更多投資，從而提高生產力（Gil-Méndez 2015, 150）。因此，自1982年起實施的結構調整，以及經濟穩定計畫，其主要方向包括：顯著減少國家在經濟部門發展進程中的參與；外部貿易開放，最終將農業部門納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農業立法改革，重新開闢土地集中化的途徑（Calva 1996; Gil-Méndez 2015, 154），俾使必要的律法規範，得以匹配相關政策的訂定及執行。

由上可知，墨西哥修憲改變了先前的路徑走向（即另一次關鍵時刻）：其一、在政治意識形態上，新自由主義確定形成優勢學說，使得「村社」或「合作社」這類具有共產思想的產物，不再主導農業進程，影響所及，土地私有化變爲民意之依歸，以及不可避免的大勢所趨；¹²其二、加入全球市場後，鑒於具規模的企業國際競爭力較高，同時也爲了配合國民習以爲常的產業文化——即歷久以來的莊園生產模式，故而政策執行上，大多選擇庇護國內的大型跨國公司，最終導致以傳統生產維生的農民，居於無力與集團式業者競爭的劣勢（Gómez-Pellón 2015, 3）。

綜上可知，這些結構變化造成許多留在農村耕種的墨西哥農民，長期並持續處在貧窮狀態。基此，學者Grammont在論著中指出：1.規模可觀的農村人口仍將存在，但不一定從事農業，而是部分依靠所處地區其他工作維生；2.農業現代化並未帶來能夠滿足就業需求的有薪工作，反而產生了大量貧農；3.相

¹² 此處需聲明的是，由於墨西哥政府並非直接以法律強制解散「村社」與「合作社」，只是鼓勵其自行考慮是否退場，因而至今仍有爲數不少的「村社」與「合作社」，繼續經營不輟。

較於歐洲大部分地區與美國的農村人口，其中多數從事第二或第三級產業活動，拉丁美洲致力於農業活動的農村人口，比例仍然偏高；4.與歐洲及美國相比，拉丁美洲的特點在於生產者所消費的物件，幾乎都是本身生產的自家商品及服務（即屬自給自足狀態）；5.雖說對一般認知的富裕國家而言，農居田作顯現的是一種令人期待的理想生活或愜意狀態，但在拉丁美洲恐非如此，堅持以為農村世界代表的就是負面價值觀者，其實依然普遍存在（Grammont 2008, 28-32）。

以上這些現象的總和，導致許多小農不得不求售土地，而後離開農村，轉身進入都市另謀生計；縱有一些小農仍然待在農村，但越來越多的人不事農業生產，改行從事第二或第三級產業，既使勉強操持農業，然其產出可能僅是全部收入的一小部分；而勢之所趨下，逐漸成就拉丁美洲「新農村」（西班牙文：nuevas ruralidades）概念的理論基礎。揆諸「新農村」最重要的特點，乃是傳統經濟邁向現代經濟的過渡結果，在此轉折的進程中，農民不斷尋求農業以外的收入，使得農村環境產生無關農業宏旨的其他功能取向。易言之，「新農村」就是從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模式，轉變為與商業市場更加緊密結合的產銷環境，這也使得農村與城市的邊界變得模糊（Gómez-Pellón 2015, 4-5）。

學者Klein（1993, 74-75）指出，1990年代初期，從事農業工作的人口約占農村部門全部勞動者70%，但農村非農業工作者（譬如從事工業或服務業者）的數目，在過去數十年間穩步增多不少，甚至比城市勞動力的成長幅度更為強勁；針對此節，Klein還觀察到農村的農業勞動者，較諸當地從事非農業活動者要窮苦得多。及至1990年代上半葉，農村從事農業活動的人口，其貧困率約為73%，但從事非農業工作的人口，只有44%處於貧困狀態。而當20世紀即將結束時，整個拉丁美洲農村人口約有40%從事非農業活動（Gómez-Pellón 2015, 6），而且這些從事非農業活動者，通常比農業勞動者更有生產力，並為前者帶來相當優渥的收入。

如果將目標從個人移到家庭，學者就此提出了拉丁美洲農村家庭的分類（Dirven 2011, 7），包括以下幾種類型：1.農業家庭，所有受僱的家庭成員，都在農業領域從事主要工作；2.非農業家庭，所有成員均從事農業以外的職業；3.多活動家庭，其中一些成員的主要職業為務農，而其他成員則從事非農

業工作；4.無業家庭，意指家庭成員皆無工作。除此之外，「新農村」還有一種「去小農化」的傾向，即有經濟基礎的農村家庭，往往提供家庭成員相當多的教育資源，目的就是為了將成員培育成農企公司的技術人員，或者自行創辦公司（Gómez-Pellón 2015, 9），此乃思路決定出路的具體實踐。

（三）產業型態結構：大型農業企業主導

傳統上，農民等同於小農，也就是以從事小規模農業為職業之人，他們多對土地擁有控制權，經濟方面則以所生產者及其自家的勞力付出為基礎，因未涉及薪資勞動，故而很難確定其所投入生產要素（資本、勞動及土地）的報酬率，以及商品交易消費的利用價值（Macías 2013, 7-8）。Macías觀察墨西哥學者針對該國小農生產業者的定義，包括：1.主要利用家庭勞動力；2.用以進行資本化的資源有限；3.產品與貿易市場有所區隔；4.生產系統相當簡易，以及極其有限的行銷、記錄、溝通等能力（Macías 2013, 9）；5.社會生產與經濟政治方面，通常皆居於次要地位，導致資本積累無法持久（Cáceres 2003, 177），自明其旨趣。

從資料上看，農林漁牧業約占墨西哥國內生產毛額的3%（CIAL Dun and Bradstreet 2018, 2），但該國的農業型態，係以大型公司主導「農村經濟單位」（西班牙文：Unidades Económicas Rurales, UER）的運作模式為主。一般認為，墨西哥UER可以分為以下五類型：第一類，未與市場聯繫的生計家庭農業（西班牙文：familiar de subsistencia sin vinculación al mercado），計有120萬個UER（比率22.4%），其中概以女性與原住民參與者居多；第二類，已與市場聯繫的生計家庭農業（西班牙文：familiar de subsistencia con vinculación al mercado），計有270萬個UER（比率50.6%）；第三類，過渡中的生計家庭農業（西班牙文：en transición），計有44.2萬個UER（比率8.3%）。而這三類都屬於家庭農業，也就是我國俗稱的「小農」，合占該國存在的UER約81.3%。扣除前揭小農占比後，剩下的18.7%UER則皆歸屬於企業化農業，其中又分為獲利薄弱的企業（西班牙文：empresarial con rentabilidad frágil），約占全部UER的9.9%，以及生意興隆的企業（西班牙文：empresarial pujante），約占全部UER的8.4%；至於競爭力強大的企業（西班牙文：empresarial dinámico），其實僅占全部UER的0.3%（Ramírez-Juárez 2022, 558）。

墨西哥小農基本上屬於窮苦一族，如與坊間的農企業相較，無論在生產、資本、能力及收入方面，皆存在偌大差距。回溯1980年代進入新自由主義前夕，全國29%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地區，但僅貢獻了6.1%的國內生產總值。及至墨西哥於1986年加入GATT，後繼接任總統的墨西哥革命制度黨領袖卡洛斯·薩利納斯·德·戈爾塔里（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亦曾於1995年指出：

到20世紀的最後一個3分之1，對農民本身來說，小面積的農地已經變成一場噩夢，其中半數以上家庭擁有的土地不超過2公頃，其他家庭有的甚至連1公頃土地都無，僅能犁幾條犁溝。而且近3分之2的臨時耕作面積上，玉米種植蔚為大宗，但其中一半面積的收成，受限每公頃的產量不到1噸，是以難有可以銷售給市場的剩餘產出。因此，囿於以上惡劣條件，致使農民種植的作物通常僅夠自己消費，而這種情況帶來的後果，無疑是災難性的（Macías 2013, 11）。

面對墨西哥農村普遍民生凋敝的衰敗景象，顯而易見地理應銳意改革，繼則除弊興利，不過多數人認為癥結不在農民身上，而是所處的結構問題（Macías 2013, 12）；既然是結構問題，墨西哥新自由主義支持者並不認為僅僅升級小農產業，就能使其具有貢獻經濟成長的強大能力，反倒認為小型農地的存在，對於整體農地的資本化與競爭力進程，形成了重大障礙，故而冀望藉由實施結構性調整手段，採取以出口為導向的舉措，以及輔助跨國農企公司成長壯大的政策，期能振衰起敝，從而新型的「新自由主義」農業發展模式，於焉展開（González-Estrada 2016）。¹³

在該模式運作下，促使墨西哥農業轉由極少數的企業家主導，而這些只占據國內530萬個UER其中0.3%競爭力強大的企業，卻貢獻大部分農業產業銷售額（SAGARPA and FAO 2012, 18），二者差比之大，不得不令人驚訝。對此

¹³ 小農消失以後，可能隨之發生糧食安全相關問題，但鑒於本文旨在解釋墨西哥為何選擇以觀光主導農村再生，故而此處不多展開敘述，以免失焦；讀者如有興趣，或可比較中國大陸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下的糧食安全治理機制，詳見參考文獻所列——學者林義鈞分別於2017年與2020年撰寫的兩篇文章。

González-Estrada (2016, 698) 亦指出，貧困農民到後來，通常不親事耕種，而是將自家土地出租，轉由統包公司代為農作。

而被寄予厚望的墨西哥農企公司，由於頗具產銷實力，故在市場上確有其競爭力。例如2012年墨西哥種植了5千公頃的莓類（包括草莓、黑莓、藍莓及覆盆子），產量46.5萬噸，價值5.5億美元，其中生產草莓的主要公司計有Driscoll's、M. Steta、Aldo Mares及BerryMex等家（González-Estrada 2016, 700）；而墨西哥又是向美國出口草莓的主要國家，其數量約占美國進口同類產品的96%（Muratalla-Lúa, Contreras, and Arévalo 2013, 10）。至於其他農企公司，包括墨西哥最大的食品公司Group Bimbo（2022年營業額3,987億7,000萬墨西哥比索（peso），約合204億3,700萬美金），以及名列第二的食品公司Sigma Alimentos（2022年營業額1,383億1,400萬墨西哥比索，約合68億1,700萬美金）等企業，規模都極為龐大。¹⁴

綜上，在當時的結構下，墨西哥政府最需要解決的，其實就是棘手的小農貧窮問題，而非農業是否消失議題。¹⁵事實上，小規模農業生產是否應該或是能否在現代農業中繼續存在，長期以來皆是該國論辯不斷的主軸議題（Ferrer 2004）。倘若純以貿易觀點論之，墨西哥認為跨國農企公司才是貢獻農業產值的經濟單元，而非充其量僅能自給自足或是只求溫飽生活的小農堪可比擬，顯然尚非無的放矢。

參、去中心化的觀光政策嘗試與農村再生

在理論上，新自由主義強調政府必須嘗試增強個人從國家中脫離的自主性，並以在地主動發展做為國家干預的替代手段，繼則調和市場自由與國家建

¹⁴ 詳細資料請參閱以下網址：<https://es.statista.com/estadisticas/1156191/empresas-del-sector-alimentos-ventas-mexico/>。

¹⁵ 職是之故，代表50萬名國內小農的12個農民團體，即曾於2002年組成名為「農田再也無法承受」（西班牙文：El Campo no Aguanta Más）的聯盟，主要目標即是要求制止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下，擬於2003年實施的糧食自由化貿易，但遭政府部門拒絕彼等訴求，不過該國仍將此次抗議事件當成國際談判籌碼，俾能爭取更優的交換條件（Morales-Moreno 2008, 317）。

設之間的對立主張；而在實踐上，一手主導推動墨西哥加入GATT的總統薩利納斯，即是肯定前開論述的關鍵人物（O'Toole 2003, 278-279）。最終，墨西哥在觀光政策的謀劃上，嘗試將文化與自然景觀商品化，並給予私部門相當地位，同時放鬆政府管制，推動官民協力合作，且在創造市場價值的同時，使其形成永續管理的大好局面；故而魔幻農村或其他類似計畫，其實就是墨西哥爲了上揭嘗試所踏出的鮮明腳印。

一、農村觀光先導型計畫與魔幻農村計畫

事實上，早在墨西哥加入GATT之前的1970年代，就能觀察到一些以當地社群爲主體的觀光政策與法律，例如1971年制定的墨西哥《農業改革法》（西班牙文：*Ley Federal de Reforma Agraria*），內開第144條出現的「旅遊合作社」（西班牙文：*ejido turístico*），概念即爲：「對合作社或社區的非農業與非林業資源的工業及商業開發，特別是其中可用於旅遊、漁業或礦業的資源，只能由合作社的管理部門直接或與協力廠商合作進行處理，且須遵守法律規定，並根據可能的情況，經由該合作社大會、農業及殖民事務部門授權後行使之」。¹⁶

迨至1982年之後，墨西哥政府開始歷經自國家主導經濟模式至新自由主義模式的過渡時程，其間逐漸減少農村公共支出、允許出售合作社土地等舉措，致使「新農村」現象從而應際而生（Mendoza, Hernández, and Villarreal 2009, 14）；與此同時，政府在旅遊領域的主要功能，隨之轉型爲市場與公共利益的維護者，並開始嘗試策進符合新自由主義理念的永續旅遊，即由下而上推展相關觀光活動。嗣於1990年代，時任墨西哥總統的薩利納斯，頒行以觀光業提高農村與原住民收入的重大政策，並爲此創建「原住民、生態及生產永續發展項目」（西班牙文：*Proyecto de Pueblos Indígenas, Ecología y Producción para el Desarrollo Sustentable*），以及「殖民城市」（西班牙文：*Ciudades*

¹⁶ 原文請參閱以下網址：<https://legislacion.scjn.gob.mx/Buscador/Paginas/wfArticuladoFast.aspx?q=Y+n2DS/TTqRhSVU2qmdsvnZwq8R0Hys1fvqxVj2QmCoxj27z0yyMMc2Dvw+1AcyGbMWNL5WPQEwY7uvnCAnerA==>。

Coloniales)、「馬雅世界」(西班牙文：Mundo Maya)及「神之路」(西班牙文：La Ruta de los Dioses)等廣義上的原鄉改造計畫，而且執行成效顯著，故被認為其乃該國魔幻農村計畫的蝶變前身(Repetto and Rosado 2021, 165)。

至於墨西哥魔幻農村計畫，全稱為「永續旅遊區域發展暨魔幻農村計畫」(西班牙文：Programa de Desarrollo Regional Turístico Sustentable y Pueblos Mágicos)，究其宗旨在於「改善地方的基礎設施與條件，強化觀光服務提供者的能力，協助旅客流動，並藉由多元化供給來推動觀光產品發展」(DOF 2018, 3)，截至現今(2024年)為止，該國共有177處場域，詳如附錄「墨西哥魔幻農村列表」所示。

礙於篇幅，本文並未深入探討任何一個魔幻農村，因為無論如何選擇，難免都有以管窺天之虞，不過藉由彙整該表，仍能歸納以下若干重點，提供讀者參閱：第一，其中大部分農村，呈現一、二、三級產業混雜的情況，雖說有些地區勉能查知各產業具體比重，但因每年度數據變動幅度不一，故而多數地區欠缺正式統計資料，不過大致上幾乎皆以農業與觀光業為主，至於製造業則乏見經營者(如有，則多局限於農產食品加工)；如若某些地區另有特殊產業，則在表中另行標註。第二，各個魔幻農村的人口數量，彼此差距非常巨大，其中包括因為毒梟戰爭導致人口不足百數(目前已恢復正常狀況)的米耶爾(西班牙文：Mier)，以及現居約65萬人的特拉克帕克(西班牙文：Tlaquepaque)，堪為具代表性的例證(雖然皆是特例)；不過值得注意的，即大部分魔幻農村的人口規模多未超過5萬人，應稱得上規模不大。第三，截至2023年為止，墨西哥擁有35處世界遺產，排名世界第七，然而縱在人文或自然景觀上坐擁如此優勢，但依靠世界遺產做為行銷賣點的魔幻農村，則是寥寥可數(表中羅列者僅十餘處)，許多懷抱世界遺產者，也並未搶搭魔幻農村列車，顯示墨西哥政府洵非全然憑恃世界頂級景點做為運作魔幻農村計畫的核心，而所看重的，概以地方特色建構為主要考量。

大體而言，如欲申請加入墨西哥的「魔幻農村」族群，通常尚需符合以下門檻規定。首先，當地必須常住相當數量的居民，且位於距旅遊目的地不超過200公里或陸地2小時路程的距離；至於其他次要條件，大抵臚列如次：1.正式

成立魔幻農村委員會：出示一份確定該委員會的文件副本（另需提交原件以供核對），包含成員姓名、5年工作計畫、內部運營規則等要項；2.提交同意加入該計畫的會議紀錄；3.該州州議會的同意證明：憑以履行對當地旅遊發展年度預算的挹注承諾；4.基於該計畫而產生的促進旅遊細部計畫：提出由市與州當局發布的文檔，並確認其中經由各自項目組合的捐款承諾，以及年度可用金額；5.更新至少3年期的市政旅遊發展計畫；6.制定並提供公共服務及旅遊的支援法令；7.具地方特色且能展現象徵性吸引力的證據（必須證明當地至少有一處類似世界遺產場址的旅遊景點，始能符合獨特性、不可替代性及真實性的要求）；8.提供能在緊急情況下協助遊客避險的公共安全服務基礎設施；9.公私部門對旅遊業發展的具體投資內容；10.該委員會認為與旅遊活動相關的其他要素（Secretaría de Turismo 2014, 11-14）。即以墨西哥近20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1.2億人口的規模來看，行之業已20年的魔幻農村計畫，迄今審查通過並准予列冊者只有177處，則其對於質量管控之落實程度，自不待言。而申請方如能獲得使用魔幻農村的標誌與稱號，將有權利將其做為商標使用，此外，還能收到該國聯邦政府的資金挹注，用於加強基礎設施、提升服務品質，以及進行形象改善等工程（Camarena 2016）。

上述條件看似繁雜，其實可以歸類為兩大要點：第一，申請方必須先自主成立「魔幻農村委員會」來規劃並執行計畫，而該委員會的作用，主要係向墨西哥旅遊部（西班牙文：Secretaría de Turismo）提交各類相關報告及證明文件，而該委員雖屬前置要害部門，但僅扮演各級政府與當地居民之間的橋樑角色，尚不具有管理或分配所得資源的權限。再就其規範而言，魔幻農村委員會須由最多10位代表組成，擁有發言及投票權，其中包括州旅遊部門、市政當局、學者及民間社團等公私部門的代表，均得入會。此外，在魔幻農村委員會內，另應指定其中一位私部門代表擔任主席，並由州旅遊部門或市政當局推出的另一位代表，兼任秘書之職。也就是說，該計畫摒棄家長式領導或管治方式，而在重視地方參與的大前提下，希望藉由由下而上的共識決議，先行貫通脈絡，繼則全力以赴，落實案關政策的推動作業。

對於大部分農村居民來說，「新農村」現象意味著農業已經無法確保生活無慮，只能先行進入第二或第三級產業以謀自活，並基於本身的潛在可能性

進行評估，其後根據社區的社會、經濟、政治及文化條件，提供相關服務，繼則通過與政府洽談方式，積極爭取財政資源最大化，最終再以集體形式應對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結構改變，以及其所延伸的貧困風險與隱患；是故在此前提下，發展觀光無疑是擇優而用的最佳選項之一（Mendoza, Hernández, and Villarreal 2009），從而形成加入魔幻農村的念想與驅動力。

二、負面批評

整體視之，魔幻農村在商業運轉上相當成功，而如此耀眼的成績，當然極大程度地應歸功於墨西哥慘澹經營的百年觀光產業，及其積累的堅韌實力，皆足以傲視拉丁美洲群儕；其次就質而言，雖說該國安全、基礎設施及投資環境等國力綜合評估無法普獲肯定，甚且偶突發事件所造成的負面形象，迄今仍難以有效扭正，然而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2021年報告明確指出，墨西哥觀光品質名列美洲第3（僅次於美國與加拿大），居世界第40位，遠勝其他文化資源條件相當的美洲國家（例如秘魯、智利等國）；而在量的方面，該國遊客人數排名全球第3。¹⁷設若以此評之，魔幻農村計畫頗能達到墨西哥政府的預期效果，但除了觀光成效卓著以外的批評或抨擊，依然不絕於耳；大致來說，主要在於地方由下而上治理的理念難以落實，以及可能造成地方失真與農村同質化兩大問題。類此不利情況，平實而言應足以令該國主政者引以為戒，進而優化計畫，以策來茲所需。¹⁸

（一）由下而上治理的困境

為了完美演繹新自由主義理念，魔幻農村計畫使出的手段，即是鼓勵地方層級的私部門，做為某種可自我治理的主體，培育堅毅不撓的創業精神，採行類似企業管理的相應模式，參與生產機制，期能提升自我價值，強化管治規制

¹⁷ The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tourism, number of arrival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T.INT.ARVL?most_recent_value_desc=true (April 13, 2025).

¹⁸ 至於觀光人潮增加後衍生的各種延伸問題，例如犯罪率增加或環境惡化等，屬國家治理是否有成的重要參考指標，而非魔幻農村計畫本身設計不良有以致之，如欲澈底析論清楚，恐需耗費大量篇幅。緣此，本文僅聚焦於魔幻農村計畫及其制度化後，由其本身推演而出的內生問題。

（Lemke 2001, 202）；然而實際執行成效卻遭受不少批評，主因所謂由下而上的「下」，在許多情況下仍是地方菁英主導的局面，而非嚴格意義上的普羅大眾，得以崢嶸頭角者。曾有研究指出，許多魔幻農村——譬如多洛莉絲·伊達爾戈（西班牙文：Dolores Hidalgo）、哈爾帕（西班牙文：Jalpa）、瓦列德布拉沃（西班牙文：Valle de Bravo）及諾奇斯特蘭（西班牙文：Nochistlán）等地，一般居民並未實質參與申請魔幻農村計畫（Levi 2018, 17）；甚至某些魔幻農村——譬如在「蘋果的薩卡特蘭」（西班牙文：Zacatlán de las Manzanas），所謂民間社會代表人選幾乎不曾更替，倘若循此特例推論之，難免令人合理懷疑，其中似有特定勢力試圖壟斷地方觀光政策話語權的情況（Lara 2018, 112-119）。此外，也有學者指出，前揭關鍵推動者——魔幻農村委員會，由於各自發揮的功能取向參差不齊，而且不同地方的角色介入程度互異，因此，雖有行事積極、效用明顯者，但不容否認的，亦不乏有名無實，甚至任由政府部門或地方菁英暗中把持或完全主導的極端例子（Levi 2018, 18），故而不宜一概而論。

此外，由於不少脆弱群體甫一開始就被排除在決策圈外，以致無法參與當地所實施的計畫，因而成果不克雨露均霑，久之難免產生分配不公問題（Levi 2018, 10）。再者，許多著重經濟效益的學者，也曾指摘魔幻農村計畫帶來的工作機會，大多只是與居民之前生活無關的較低薪資職缺：例如導遊、工藝品製造、餐飲服務或食品衛生等類型（Cuevas 2016, 10），致使生計維持不易。

（二）地方失真與農村同質化

鑒於新自由主義傾向於讓社區成為類似企業的單位，是以地方必須進行理性選擇，俾在市場利基上找到自我定位，並保持最強大的競爭力。對此《魔幻農村計畫的操作規則》（西班牙文：Reglas de Operación Programa Pueblos Mágicos）指出，¹⁹地方必須提出有效提升旅遊競爭力的策略，特別是針對強化特色部分，更是重中之重，而且還需證明這種策略能夠持續長久，並得逐年通過審查，否則即使目前列冊在案，日後也有再被移出魔幻農村清單的可能。

¹⁹ 詳細資料請參閱以下網址：<https://transparencia.info.jalisco.gob.mx/sites/default/files/Reglas%20de%20Operaci%C3%B3n%20Programa%20Pueblos%20M%C3%A1gicos.pdf>。

此外，僅僅依靠當地文化及自然風貌的獨特性，並不足以使旅遊業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因此，魔幻農村必須配合由墨西哥旅遊部頒行之要求觀光業者實施的各種規範，以及能夠增加營利能力與競爭實力的認證資訊（Levi 2018, 17）。

上述主要係指魔幻農村奠基於地方的獨特性，故其得以根據當地文化的不同表現形式，提供內含特定主題的旅遊服務，包括手工藝品、慶祝活動、傳統美食、生態導覽、釣魚等項。而在此框架內，魔幻農村令人期待的旅遊業，更應發揮繼往開來的前導作用，做為驅動當地整體進步的隱形工具，並納入地方政府所規劃的計畫（Castillo and Lara 2008, 122-124）。至於魔幻農村至關重要的漸進式任務，乃優先維護或再造某些具有觀光潛力的歷史文化區域，抑或公認的自然生態景觀；此外，魔幻農村亦可展示當地的無形文化遺產（資產），例如傳統音樂、舞蹈、服飾、語言或烹飪手法等值得發揚延續部分，並將原汁原味的異國情調精心包裝整合，再以復古面貌重新呈現在觀光客面前。至於最是吸睛的墨西哥傳統建築，無論外貌、形象、風格、氣勢、圖騰符號及周遭植被、街道巷衢，皆應妥善保養維修回復舊觀，並維持國外旅客想像中的道地墨西哥景象；換言之，政府當局支用公帑發動在地民衆，同心協力地將魔幻農村建構成加倍兼具「墨西哥風情」的觀光景區（Castillo and Lara 2008; López 2009; Rascón 2013），即是新興旅遊產業的代表性鉅作。

由於魔幻農村要求將當地的自然景觀與文化特質轉化為一種可以換成貨幣的有償資源，略言之，即所謂的「商品化」（Cuevas 2016, 10），這就造成魔幻農村並非單純羅列出來提供觀光客參採的清單，而是地方政府藉由所搭配的特定形象與符號為材料，以遊客想要看見的內容為改造藍本，公開展示的前臺場景，基本上其所彰顯的全是正面形象或圖騰，至於參觀地區可能潛在的負評現實面則未考慮，且不打算涵蓋在內，究其目的無非配合遊客心理——即藉由觀光旅行，試圖擺脫原本的真實生活；其間縱使前臺偶見帶有現實取向的場景，可能也是特地設計而讓具有特殊需求的遊客，四處尋找真相的「假事件」（pseudo-event）（詳參Boorstin 1992, 9-12）。綜言之，魔幻農村失真之處，在於過度站在觀光客角度，重新規劃改造城鄉面貌，揆其用意，主要為了促使墨西哥成為北方諸國人民理想的第二居所，故需讓觀光客在享有異國風情

之餘，又有回到故鄉的感覺，形同將他們包覆在「環境泡泡」（environmental bubble）之中。

然而在此過程中，可能產生地方失真與農村同質化問題。在失真問題上，這種以遊客需求為視角出發的觀光樣板打造，自然並非真實的墨西哥，而且時有手段過於極端的疑慮。譬如曾有學者批評金塔納羅奧州的魔幻農村巴卡拉（西班牙文：Bacalar），以及下加利福尼亞州（西班牙文：Baja California），主要抱怨其城市形象皆被簡化為中心廣場觀光區及其他非觀光區場景，甚至離開觀光區不過150公尺，魔幻農村即變回普通農村模樣（Levi 2018, 19）；至於其他魔幻農村，也出現當地資本家（譬如特基拉，西班牙文：Tequila）（López 2009）或美國旅遊業投資者（例如阿拉莫斯，西班牙文：Álamos）一起加入營造「墨西哥風情」的類似情況，而令人諷刺的，這種虛假景觀，其實就是墨西哥政府想要建構的舞臺（Clausen and Velázquez 2010, 41-43）。

另在農村同質化方面，雖然魔幻農村強調異質性，表面上各個魔幻農村百花爭鳴，但當所有傳統農村都凝視魔幻農村計畫，用以建構自身的想像時，觀光客偏好的模樣，勢將成為前者共同前進的目標。試再深入析之，墨西哥各地農村的終極目標，幾無例外地皆欲將與旅遊、文化遺產或自然遺產保護有關的空間，進行特殊布置規劃，打造出一個觀光客想像中的、宛如夢境般的墨西哥小鎮——譬如：到處可見白色外觀的古老房子，貼上美麗瓷磚的山牆屋頂，以及鋪滿鵝卵石的步行街道；另一方面，魔幻農村還要盡可能地達到北方諸國的現代化水準。因此，墨西哥政府忙於精心粉刷居民住家外牆，隱藏電纜桿線，廣鋪人行道，移除雜草亂叢，修復公共建築（Levi 2018, 19），為的就是讓一切作為或安排，能夠完美契合觀光客的口味與喜好。

因此，即使客觀論之，墨西哥在觀光產業上產出的豐碩果實，遠遠超過其被期待的表現；然而，但對於其他國家而言，該經驗固然值得學習，但在借鑒之際，亦須謹慎衡量其中可能面臨的犧牲、損耗、風險及不足之處，避免重蹈失利覆轍，並探尋出一條既可取得成功、又能減少代價的發展道路。

肆、結語

墨西哥在觸及新自由主義之前（二戰後至1970年代），觀光業與農業的交集較少，其中觀光業方面，主要目標定位於政府主導發展的重要硬體工程，包括大力建設公共基礎設施（如橋樑、公路）及旅遊設施（如酒店、休息站）等；而在農業方面，則有大量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於自己擁有的農村家園。但自墨西哥接納新自由主義之後，跨國企業卻成了農業產銷結構轉變的主角，而原本的傳統農村，從此也不再僅具單純的糧產功能，影響所及，無論農業升級、改造、轉型或棄農改行，皆是仍具小農身分者亟需面對的嚴肅選項。

該國政府在面對上述衝擊時，因路徑依賴所致，最終選擇發展觀光業做為主要手段，用以解決農村經濟問題；故而嘗試設計符合新自由主義理念的嶄新觀光政策，期望達到農村再生的效果。而這些內外因子匯集融合並付諸實行後，短期內即順勢華麗轉身，形成該國別樹一幟的「墨西哥模式」，繼則風靡全境，甚且擴至其他西班牙語系國家。

惟平心而論，墨西哥魔幻農村計畫也非完美無缺，尤以其中若干環節出現的問題——譬如執行過程，能否真正達到去中心化的效果，以及各農村是否朝向建構虛偽觀光舞台，並逐漸同質化等周折情事，皆曾遭到不少詬病；不過就啟動農村再造的前瞻立場觀之，該國行之多年的特殊發展模式及其規劃與實踐作為，仍應存有值得吾人聞見之處。

（收件：113年2月20日，接受：113年12月18日）

附錄

墨西哥魔幻農村列表²⁰

	州名稱	魔幻農村 名稱	是否擁有（鄰近）世界遺產	是否具有傳統農業與觀光業外的其他重要產業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所屬市鎮Municipio，如名稱不同，則另標註）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社區Localidad，魔幻農村主要單位）
1	Aguascalientes	Calvillo		精緻農業（芭樂）	58,250	21,049
2		Pabellón de Hidalgo			57,369（Rincón de Romos）	4,630
3		Real de Asientos		礦業	51,536	5,248
4		San José de Gracia			9,552	5,607
5	Baja California	Tecate		製造業（啤酒）	108,440	81,059
6	Baja California Sur	Loreto		漁業	18,052	16,311
7		Santa Rosalía		漁業	64,022（Mulegé）	14,357
8		Todos Santos			292,241（La Paz）	7,185
9	Campeche	Candelaria			46,913	11,121
10		Isla Aguada		漁業	248,845（Carmen）	7,620
11		Palizada			8,683	3,485
12	Chiapas	Chiapa de Corzo	擁有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Los Parachicos En la Fiesta Grande de Chiapa de Corzo）		112,075	55,931

²⁰ 表列人口規模資料，來自墨西哥國家統計與地理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 y Geografía），<https://www.inegi.org.mx/app/cpv/2020/resultadosrapidos/default.html?texto=Benito>，至於其他資料，則為作者自行蒐集彙編，如有訛誤疏漏之處，尚祈不吝指正。是禱。

	州名稱	魔幻農村名稱	是否擁有（鄰近）世界遺產	是否具有傳統農業與觀光業外的其他重要產業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所屬市鎮Municipio，如名稱不同，則另標註）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社區Localidad，魔幻農村主要單位）
13		Copainalá			22,192	7,125
14		Comitán			166,178（Comitán de Domínguez）	113,479（Comitán de Domínguez）
15		Ocozocoautla			97,397（Ocozocoautla de Espinosa）	43,247（Ocozocoautla de Espinosa）
16		Palenque	擁有世界遺產（Ciudad prehispánica y parque nacional de Palenque）		132,265	51,797
17		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		礦業	215,874	183,509
18	Chihuahua	Batopilas			11,270（Batopilas de Manuel Gómez Morín）	932（原住民族Rarámuri部落）
19		Casas Grandes	擁有世界遺產（Zona arqueológica de Paquimé, Casas Grandes）		11,815	7,134
20		Creel			23,351（Boconyna）	4,642
21		Guachochi			50,180	17,410
22		Hidalgo del Parral		礦業	116,662	113,843
23	Coahuila	Arteaga			29,578	15,534
24		Candela			1,643	1,404

	州名稱	魔幻農村 名稱	是否擁有（鄰近）世界遺產	是否具有傳統農業與觀光業外的其他重要產業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所屬市鎮Municipio，如名稱不同，則另標註）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社區Localidad，魔幻農村主要單位）
25		Cuatrociénegas			12,715	10,395（Cuatro Ciénegas de Carranza）
26		General Cepeda			11,898	5,535
27		Guerrero			1,643	775
28		Melchor Múzquiz			71,627（Múzquiz）	38,992（Ciudad Melchor Múzquiz）
29		Parras de la Fuente			44,472（Parras）	34,798
30		Viesca			20,305	3,522
31	Colima	Comala			21,661	9,649
32	Durango	Mapimí	擁有世界遺產（Camino Real de Tierra Adentro）		26,932	6,617
33		Nombre de Dios			19,060	5,953
34	Guanajuato	Comonfort			82,216	24,228
35		Dolores Hidalgo			163,038（Dolores Hidalgo Cuna de la Independencia Nacional）	67,101（Dolores Hidalgo Cuna de la Independencia Nacional）
36		Jalpa de Cánovas			83,842（Purísima del Rincón）	670
37		Mineral de Pozos			128,536（San Luis de la Paz）	2,856
38		Salvatierra			94,126	35,401
39		Yuriria			68,741	25,845

	州名稱	魔幻農村名稱	是否擁有（鄰近）世界遺產	是否具有傳統農業與觀光業外的其他重要產業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所屬市鎮Municipio，如名稱不同，則另標註）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社區Localidad，魔幻農村主要單位）
40	Guerrero	Ixcateopan			6,138（Ixcateopan de Cuauhtémoc）	2,493（Ixcateopan de Cuauhtémoc）
41		Taxco de Alarcón			105,586	50,399
42		Zihuatanejo			126,001（Zihuatanejo de Azueta）	70,760
43	Hidalgo	Acaxochitlán		林業	46,065	3,908
44		Huasca de Ocampo			17,607	417
45		Huichapan			47,425	9,853
46		Metztitlán			20,962	3,274
47		Mineral del Chico			8,878	533
48		Mineral del Monte			14,324	11,149
49		Tecoautla			38,010	6,701
50		Zempoala	擁有世界遺產（Sistema hidráulico del acueducto del Padre Tembleque）		57,906	7,205
51		Zimapán			39,927	14,732
52	Jalisco	Ajijic			55,196（Chapala）	11,439
53		Cocula			29,267	16,550
54		Lagos de Moreno	擁有世界遺產（Centro Histórico de la Ciudad de Lagos Moreno y Puente）		172,403	111,569

	州名稱	魔幻農村 名稱	是否擁有（鄰近）世界遺產	是否具有傳統農業與觀光業外的其他重要產業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所屬市鎮Municipio，如名稱不同，則另標註）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社區Localidad，魔幻農村主要單位）
55		Mascota			14,451	9,272
56		Mazamitla			14,043	8,142
57		San Sebastián del Oeste		林業	5,086	632
58		Sayula			37,186	28,145
59		Talpa de Allende			14,997	10,112
60		Tapalpa			21,245	5,955
61		Temacapulín			4,388（Cañadas de Obregón）	269
62		Tequila	擁有世界遺產（Paisaje agavero y antiguas instalaciones industriales de Tequila）	製造業（龍舌蘭酒起源地與大規模造酒地）	44,353	31,115
63		Tlaquepaque			687,127（San Pedro Tlaquepaque）	650,123
64	México	Aculco			49,266	1,957（Aculco de Espinoza）
65		El Oro			36,937	5,970（El Oro de Hidalgo）
66		Ixtapan de la Sal			36,911	19,326
67		Jilotepec			87,671	12,671（Jilotepec de Molina Enriquez）

	州名稱	魔幻農村 名稱	是否擁有（鄰近）世界遺產	是否具有傳統農業與觀光業外的其他重要產業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所屬市鎮Municipio，如名稱不同，則另標註）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社區Localidad，魔幻農村主要單位）
68		Malinalco			28,155	8,921
69		Metepéc			242,307	30,203
70		Otumba			36,331	9,925 （Otumba de Gómez Farías）
71		Teotihuacán de Arista y San Martín de las Pirámides			約58,507（Teotihuacán）	24,575 （Teotihuacán de Arista）與 29,182（San Martín de las Pirámides）
72		Tepotztlán			103,696	40,279
73		Tonatico			12,912	7,021
74		Valle de Bravo			61,590	24,167
75		Villa del Carbón			51,498	9,598
76	Michoacán	Mineral de Angangueo	鄰近世界遺產（Reserva de la Biosfera de la Mariposa Monarca）（直線距離約10公里）		10,892（Angangueo）	3,977
77		Cotija		精緻農業（Queso Cotija，墨西哥起司）	20,198	14,074 （Cotija de la Paz）
78		Cuitzeo del Porvenir			29,910 （Cuitzeo）	10,983

	州名稱	魔幻農村 名稱	是否擁有（鄰近）世界遺產	是否具有傳統農業與觀光業外的其他重要產業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所屬市鎮Municipio，如名稱不同，則另標註）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社區Localidad，魔幻農村主要單位）
79		Jiquilpan de Juárez			36,158（Jiquilpan）	24,662
80		Paracho de Verduzco		弦樂器工藝（Lutier）	39,657（Paracho）	21,215
81		Pátzcuaro		漁業	98,382	60,811
82		Santa Clara del Cobre		銅鍛造工藝（Orfebrería）	49,896（Salvador Escalante）	16,748
83		Tacámbaro			79,540	30,519 （Tacámbaro de Codallos）
84		Tlalpujahua de Rayón			28,556 （Tlalpujahua）	3,627
85		Tzintzuntzan			14,911	3,830
86	Morelos	Tepoztlán	擁有世界遺產（Monasteries on the slopes of Popocatepetl）的部分組成（Convento de la Natividad o de la Anunciación）		54,987	14,719
87		Tlaltizapán			52,399 （Tlaltizapán de Zapata）	10,779
88		Tlayacapan	擁有世界遺產（Monasteries on the slopes of Popocatepetl）的部分組成（Museo y Centro de Documentación Histórica Ex Convento de Tepoztlán）		19,408	8,374

	州名稱	魔幻農村 名稱	是否擁有（鄰近）世界遺產	是否具有傳統農業與觀光業外的其他重要產業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所屬市鎮Municipio，如名稱不同，則另標註）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社區Localidad，魔幻農村主要單位）
89		Xochitepec			73,539	21,862
90	Nayarit	Ahuacatlán			15,393	7,259
91		Amatlán			11,536（Amatlán de Cañas）	3,267（Amatlán de Cañas）
92		Compostela de Indias			77,436（Compostela）	20,322（Compostela）
93		Ixtlán del Río			29,299	25,477
94		Jala			19,321	5,844
95		Mexcaltitán			93,981（Santiago Ixcuintla）	706
96		Puerto Ballete			41,518（San Blas）	192
97		San Blas			41,518	9,114
98		Sayulita			187,632（Bahía de Banderas）	3,390
99	Nuevo León	Bustamante			3,661	3,524
100		General Terán			14,109	6,490（Ciudad General Terán）
101		General Zaragoza			6,282	2,986
102		Linares			84,666	70,378
103		Santiago			46,784	43,019
104	Oaxaca	Capulálpam de Méndez			1,619	1,568

	州名稱	魔幻農村 名稱	是否擁有（鄰近）世界遺產	是否具有傳統農業與觀光業外的其他重要產業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所屬市鎮Municipio，如名稱不同，則另標註）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社區Localidad，魔幻農村主要單位）
105		Huautla de Jiménez			31,710	12,482
106		Santa Catarina Juquila			18,654	8,084
107		Mazunte			25,347	651
108		San Pablo Villa de Mitla			9,654	13,587
109		San Pedro y San Pablo Teposcolula			4,353	2,078
110	Puebla	Atlixco		精緻農業（盆栽）	141,793	89,314
111		Chignahuapan		製造業（聖誕樹燈泡）	66,464	22,904 （Ciudad de Chignahuapan）
112		Cholula			154,448（San Andrés Cholula）	46,996（San Andrés Cholula）
113		Cuetzalan del Progreso			49,864	6,402 （Ciudad de Cuetzalan）
114		Huauchinango		刺繡工藝	103,946	58,957
115		Huejotzingo	擁有世界遺產（Monasteries on the slopes of Popocatepetl）的部分組成（Convento de San Miguel Arcángel）			

	州名稱	魔幻農村 名稱	是否擁有（鄰近）世界遺產	是否具有傳統農業與觀光業外的其他重要產業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所屬市鎮Municipio，如名稱不同，則另標註）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社區Localidad，魔幻農村主要單位）
116		Pahuatlán			20,274	3,523 （Ciudad de Pahuatlán de Valle）
117		Tetela de Ocampo			9,642	3,651
118		Teziutlán			103,583	62,849
119		Tlatlauquitepec			55,576	9,358（Ciudad de Tlatlauquitepec）
120		Xicotepec		精緻農業（咖啡）	80,591	41,455（Xicotepec de Juárez）
121		Zacatlán			87,361	39,203
122	Querétaro	Amealco de Bonfil			66,841	7,953
123		Bernal			約4,000	
124		Cadereyta de Montes			69,075	15,512
125		Jalpan de Serra	擁有世界遺產（Misiones franciscanas de la Sierra Gorda de Querétaro）	林業	27,343	13,950
126		Pinal de Amoles			27,365	2,382
127		San Joaquín			8,359	1,957
128		Tequisquiapan			72,201	34,955
129	Quintana Roo	Bacalar			41,754	12,527

	州名稱	魔幻農村 名稱	是否擁有（鄰近）世界遺產	是否具有傳統農業與觀光業外的其他重要產業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所屬市鎮Municipio，如名稱不同，則另標註）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社區Localidad，魔幻農村主要單位）
130		Cozumel			88,626	84,519
131		Isla Mujeres			22,686	13,174
132		Tulum	距離坎昆最近的魔幻農村（約100公里）		46,721	33,374
133	San Luis Potosí	Aquismón			48,359	2,174
134		Ciudad del Maíz			30,320	10,943
135		Real de Catorce			6,257（Catorce）	1,395
136		Santa María del Río		紡織工藝（Rebozo）	39,880	無資料
137		Tierranueva			7,966	4,960
138		Xilitla			49,741	6,644
139	Sinaloa	Cosalá			17,012	7,888
140		El Fuerte			96,593	12,848
141		El Rosario			52,345（Rosario）	17,097
142		Mocorito			40,358	5,926
143		San Ignacio			19,505	4,810
144	Sonora	Álamos			24,976	10,961
145		Ures			8,548	3,619（Heroica Ciudad de Ures）
146		Magdalena de Kino		食品製造與外銷	33,049（Magdalena）	30,429
147		San Carlos			156,863（Guaymas）	7,411

	州名稱	魔幻農村名稱	是否擁有（鄰近）世界遺產	是否具有傳統農業與觀光業外的其他重要產業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所屬市鎮Municipio，如名稱不同，則另標註）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社區Localidad，魔幻農村主要單位）
148	Tabasco	Frontera		漁業	82,409	75,242
149		Tapijulapa			47,905（Taco-talpa）	3,095
150		Teapa			58,718	29,068
151	Tamaulipas	Mier			6,385	6,061（2010年毒梟戰爭時曾剩100人）
152		Tula		紡織工藝（Cuera tamaulipeca）	28,230	10,977（Ciudad Tula）
153	Tlaxcala	Huamantla	擁有世界遺產（Monasteries on the slopes of Popocatepetl）的部分組成（Conjunto Conventual Franciscano y Catedralicio de Nuestra Señora de la Asunción）		98,764	59,871
154		Ixtenco			7,504	7,436
155		Tlaxco			45,438	17,978
156	Veracruz	Coatepec			93,911	55,720
157		Córdoba			204,721	139,075
158		Coscomatepec			59,471	16,364
159		Naolinco			22,835	9,554（Naolinco de Victoria）
160		Orizaba			123,182	120,500

	州名稱	魔幻農村 名稱	是否擁有（鄰 近）世界遺產	是否具有傳統農 業與觀光業外的 其他重要產業	人口數量規模 （該農村所 屬市鎮Muni- cipio，如名稱 不同，則另 標註）	人口數量規 模（該農村 社區Locali- dad，魔幻 農村主要 單位）
161		Papantla			159,910	55,452
162		Xico			39,623	21,585
163		Zozocolco de Hidalgo			14,524	3,794
164	Yucatán	Espita			16,779	12,320
165		Izamal			28,555	17,841
166		Maní			5,968	4,715
167		Motul			37,804	26,081 (Motul de Carrillo Puerto)
168		Sisal			35,137 (Hu- nucmá)	2,078
169		Tekax			45,062	28,461 (Tekax de Álvaro Ob- regón)
170		Valladolid			85,460	56,494
171	Zacatecas	Guadalupe	擁有世界遺產 (Real Monasterio de Santa María de Guadalupe)		643,143	170 029
172		Jerez de Gar- cía Salinas			59,910 Jerez	46,132
173		Nochistlán de Mejía			27,945	16,814
174		Pinos			72,241	6,304
175		Sombrerete	擁有世界遺產 (Camino Real de Tierra Adentro)		63,665	25,068

	州名稱	魔幻農村 名稱	是否擁有（鄰近）世界遺產	是否具有傳統農業與觀光業外的其他重要產業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所屬市鎮Municipio，如名稱不同，則另標註）	人口數量規模（該農村社區Localidad，魔幻農村主要單位）
176		Teúl de González Ortega			5,356	3,461
177		Villanueva			31,558	13,641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Perspective on Rural Regeneration and Tourism in Mexico: “Pueblos Mágicos”

Yin-Cheng Hsu

Associate Professor, Master Degree Program in Ocean Policy,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Ming-Hao Yang

Assistant Professor,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Ocean Law and Policy,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framework to address the research question: What accounts for the formation of Mexico’s tourism-oriented rural revitalization model, and what are its distinctive features? It then seeks to elucidate the following points: the Mexican government has historically taken a state-led approach to tourism development, striving to enhance the country’s appeal as a global destination in a comprehensive manner. This has included the creation of entirely new cities, such as Acapulco and Cancún, as flagship examples of successful tourist hubs. By fulfilling the role of stage-setter within the global tourism system, Mexico has garnered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inadvertently fostering a form of “path dependence.” Subsequent to the advent of neoliberalism, the country continued to rely on tourism as a strategic tool to address urban-rural disparities. However, it also began experimenting with 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models, gradually shaping a new approach to tourism policy. Over time, rural areas in Mexico evolved toward functional diversification, transitioning from a focus

solely on food production to prioritizing their role as platforms for inbound tourism, particularly for visitors from North America. Ultimately,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state-led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adoption of neoliberal, decentralized policies gave rise to Mexico's unique "Pueblos Mágicos" program.

Keyword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ourism Policy, Mexico, Rural Rejuvenation,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參考文獻

- 小田切徳美，2014，《農山村は消滅しない》，東京：岩波書店。Odagiri, Tokumi. 2014. *Nousanson wa syoumetu shinai [Rural Communities Will Not Disappear]*. Tokyo: Iwanami Syoten.
- 山下祐介，2014，《地方消滅の罠—「増田レポート」と人口減少社会の正体》，東京：筑摩書房。Yamashita, Yuusuke. 2014. *Tihou syoumetu no wana: "masuda repo-to" to zinkou gensyou syakai no syoutai [The Trap of Regional Extinction: The True Nature of the "Masuda Report" and Population Decline Society]*. Tokyo: Tikuma Syobo.
- 木下齊，2016，《稼ぐまちが地方を変える—誰も言わなかった10の鉄則》，東京：NHK出版。Kinoshita, Hitoshi. 2016. *Kasegu machi ga tihou o kaeru-dare mo iwanakatta 10 no tessoku [Towns That Earn Change Regions: 10 Iron Rules No One Mentioned]*. Tokyo: NHK Syuppan.
- 田中輝美，2017，《関係人口をつくる一定住でも交流でもないローカルイノベーション》，東京：木楽舎。Tanaka, Terumi. 2017. *Kankei zinkou o tukuru-teizyuu demo kouryuu demo nai ro-karu inobe-syon [Creating Relational Population: Local Innovation Beyond Settlement or Exchange]*. Tokyo: Kirakusya.
- 吉田雅彦，2021，《地域マネジメントー地方創生の理論と実際》，宮崎：鉦脈社。Yoshida, Masahiko. 2021. *Tiiki manezimento: tihou sousei no riron to zissai [Regional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Miyasaki: Koumyakusya.
- 李天申，2020，《臺灣行政法人制度推動歷程的歷史制度分析》，《政治科學論叢》，86：151-190。Li, Tian-shen. 2020. "Taiwan xingzheng faren zhidu tuidong lichen di lishi zhidu fenxi"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aiwan's Executive Yuan Agencies System].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151-190. <http://doi.org/10.6166/TJPS>
- 李長晏，2023，《地方創生制度的理論建構與策略途徑：政策整合觀點》，

- 李長晏編，《地方創生理論概念與個案應用》：3-26，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Li, Zhang-yan. 2023. “Di fang chuang sheng zhi du de li lun jian gou yu ce lue tu jing: zheng ce zheng he guan dia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Strategic Approach of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System: A Perspective of Policy Integration]. In Zhang-yan Li, ed., “*Di fang chuang sheng li lun gai nian yu ge an ying yong*” [Concepts of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Theory and Case Applications], pp. 3-26. Taipei: Wu Nan Cultural Enterprise.
- 松永桂子，2015，《ローカル志向の時代—働き方、産業、経済を考えるヒント》，東京：光文社。Matunaga, Keiko. 2015. *Ro-karu sikou no zidai-hatarakikata, sangyou, keizai o kangaeru hinto* [The Age of Local Orientation: Hints for Thinking about Work Styles, Industry, and Economy]. Tokyo: Koubunsha.
- 林義鈞，2017，〈聯合國糧食議題安全化內容與中國糧食安全治理機制〉，《問題與研究》，56（3）：1-27。Lin, Yi-jun. 2017. “Lian he guo liang shi yiti anquanhua neirong yu zhongguo liangshi anquan zhili jizhi” [The Securitization Content of UN Food Issues and China’s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Mechanism]. *Wenti Yu Yanjiu*, 56 (3): 1-27.
- 林義鈞，2020，〈農糧財團崛起下的中國大陸糧食安全治理〉，《展望與探索月刊》，18（2）：96-110。Lin, Yi-jun. 2020. “Nongliang caituan jueqi xia de zhongguoda lu liangshianquan zhili”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in Mainland China under the Rise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onsortiums]. *Prospect & Exploration*, 18 (2): 96-110.
- 胡婉玲，2001，〈論歷史制度主義的制度變遷理論〉，《新世紀智庫論壇》16：86-95。Hu, Wan-ling. 2001. “Lun lishi zhidu zhuyi de zhidu bianqian lilun” [On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New Century Think Tank Forum*, 16: 86-95.
- 徐胤承，2023，〈新大陸統治正當性與原住民——大航海時代西班牙思想家之論辯〉，《法制史研究》，40：127-158。Hsu, Yin-cheng. 2023. “Xin da lu tong zhi zheng dang xing yu yuan zhu min— da hang hai shi dai xi ban ya si

- xiang jia zhi lun bian” [Dominium and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New World: Spanish Philosophers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Journal for Legal History Studies*, 40: 127-158.
- 陳育偉，2007，〈赴德考察鄉村規劃及農村發展策略〉，<https://www.ey.gov.tw/File/BB4A39FBCBBA23C5?A=C>，查閱時間：2025/04/13。Chen, Yu-wei. 2007. “Fu de kao cha xiang cun gui hua ji nong cun fa zhan ce lue” [Study Visit to Germany on Rur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ccessed on April 13, 2025).
- 黃宗昊，2010，〈歷史制度論的方法立場與理論建構〉，《問題與研究》，49（3）：145-176。Huang, Zong-hao. 2010. “Lishi zhidulun de fangfa lichang yu lilun jiangou” [Methodological Stance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Wenti Yu Yanjiu*, 49 (3): 145-176.
- 増田寛也，2014，〈地方消滅—東京—極集中が招く人口急減〉，東京：中央公論新社。Masuda, Hiroya. 2014. *Tihou syoumetu: Toukyou ikkyoku syuutyuu ga maneku zinkou kyuugen* [Regional Extinction- Rapid Population Decline Caused by Tokyo Centralization]. Tokyo: Tyuoukouron Sinsya.
- 蔡相廷，2010，〈歷史制度主義的興起與研究取向—政治學研究途徑的探討〉，《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41（2）：39-76。Cai, Xiang-ting. 2010. “Lishi zhiduzhuyi de xingqi yu yanjiu quxiang-zheng zhi xue yanjiu tujing de tan tao” [The Emergence and Research Orientation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 Explor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pproaches]. *Journal of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41 (2): 39-76. [http://doi.org/10.6336/JUTh/2010.41\(2\)3](http://doi.org/10.6336/JUTh/2010.41(2)3)
- 鄭心儀，2005，〈以鄉村旅遊活化地區發展之策略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學位論文。Zheng, Xin-yi. 2005. *Yi xiang cun lu you huo hua di qu fa zhan zhi ce lue yanjiu* [A Strategic Study on Revitaliz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Rural Tourism]. Kaohsiung: MA thesis,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 藤山浩，2015，〈田園回帰1%戦略—地元にと仕事を取り戻す〉，埼玉：

- 農山漁村文化協會。Huziyama, Hiroshi. 2015. *Tenen kaiki 1% senryaku: zimoto ni hito to shigoto o torimodosu* [*Rural Return 1% Strategy: Bringing People and Jobs Back to Local Communities*]. Saitama: Nosan Gyoson Bunka Kyokai.
- Aaron, Paul, and David Musto. 1981. *Alcohol and Public Policy: Beyond the Shadow of Prohibi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Acosta, Jesús Ángel Enríquez, and Manuela Guillén Lúgigo. 2017. "Turismo cultural e identidad en el pueblo mágico de Álamos, Sonora, Méxic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Tourism*, 3 (4): 495-512.
- Boorstin, Daniel. 1992. *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 Cáceres, Daniel. 2003. "El campesinado contemporáneo." In Ricardo Thornton and Gustavo Cimadevilla, eds., *La Extensión Rural en Debate*, pp. 173-198. Buenos Aires: Ediciones inta.
- Calva, José Luis. 1996. "La reforma económica de México y sus impactos en el sector agropecuario." In Philippe Bovin, ed., *El Campo Mexicano. Una Modernización a Marchas Forzadas*, pp. 31-75. Cemca Orstom, México.
- Camarena, Gina Monserrat Núñez. 2016. "Los pueblos mágicos de México: Mecanismo de la SECTUR para poner en valor el territorio." VIII Seminario Internacional de Investigación en Urbanismo. Departament d'Urbanisme i Ordenació del Territori; Universitat Politècnica de Catalunya. <https://upcommons.upc.edu/handle/2117/102323> (April 13, 2025).
- Capoccia, Giovanni and R. Daniel Kelemen. 2007. "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 Theory, Narrative, and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World Politics*, 59 (3): 341-369. <https://doi.org/10.1017/S0043887100020852>
- Castillo, Guadalupe Hoyos, and Oscar Hernández Lara. 2008. "Localidades con recursos turísticos y el Programa Pueblos Mágicos en medio del proceso de la nueva ruralidad. Los casos de Tepotzotlán y Valle de Bravo en el Estado de México." *Quivera. Revista de Estudios Territoriales*, 10 (2): 111-130.

- Castree, Noel. 2010. "Neoliberalism and the Biophysical Environment: A Synthe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Research."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1 (1): 5-45. <http://dx.doi.org/10.3167/ares.2010.010102>
- CIAL Dun and Bradstreet. 2018. "Análisis de la Industria de Alimentos y Bebidas, Economic Analysis No.3." https://www.cialdnb.com/pdf/economic-analysis/food-and-beverages/MEX_Economic-Analysis_ES.pdf (April 13, 2025).
- Clausen, Helene and Mario Velázquez. 2010. "Desarrollo turístico en comunidades norteamericanas en México: el caso de Álamos, Sonora." *Diálogos Latinoamericanos*, 11 (17): 23-46. <https://doi.org/10.7146/dl.v11i17.113569>
- Cornelius, Wayne A. 1992.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Reforming the Ejido Sector in Mexico: An Over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LASA Forum*, 23 (3): 3-10.
- Cuevas, Sandra Cañas. 2016. "Pueblo trágico: gubernamentalidad neoliberal y multicultural en el sureste mexicano." *Revista pueblos y fronteras digital*, 11 (21): 3-30. <http://dx.doi.org/10.22201/cimsur.18704115e.2016.21.6>
- David, Paul A. 1985.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2): 332-337.
- Devine, Adrian and Frances Devine. 2011. "Planning and Developing Tourism within a Public Sector Quagmire: Lessons from and for Small Countries." *Tourism Management*, 32 (6): 1253-1261. <http://dx.doi.org/10.1016/j.tourman.2010.11.004>
- Dirven, Martine. 2011. "El empleo rural no agrícola y la disminución de la pobreza rural; ¿Qué sabemos en América Latina en 2010?" https://www.rimisp.org/wp-content/files_mf/13720850281366478485N912011EmpleoruralnoagricoladismiinucionpobrezaDirven.pdf (April 13, 2025).
- DOF. 2018. "Reglas de operación del programa de desarrollo regional turístico sustentable y de Pueblo Mágicos (PRODEMAGICO)." <http://www.sectur.gob.mx/gobmx/wp-content/uploads/2014/10/ROP-2018-en-DOF.pdf> (April 13, 2025).

- Eguiluz, Mayra N. Uribe. 2011. "La Compañía México Fotográfico en la política de turismo nacional de los años veinte." *Alquimia*, 42 (14): 22-29.
- Espinosa-Coria, Horacio. 2013. "El origen del proyecto turístico Cancún, México: Una valoración de sus objetivos iniciales a 42 años de su nacimiento." *LiminaR*, 11 (1): 154-167. <http://dx.doi.org/10.29043/liminar.v11i1.27>
- Ferrer, Guillermo. 2004. "Campesinistas y descampesinistas, el debate y su influencia en los programas de intervención." *Revista de Desarrollo Rural y Cooperativismo Agrario*, 8: 217-228.
- Fletcher, Robert. 2019. "Neoliberalismo y turismo." In Ernest Cañada and Ivan Murray, eds., *Turistificación Global. Perspectivas Críticas en Turismo*, pp. 37-52. Icaria.
- Fuller, Stephanie. 2014. "Pan-American Highways: American Tourism to Mexico and 1950s Hollywood Film." *CINEJ Cinema Journal*, 3 (2): 5-33. <http://dx.doi.org/10.5195/cinej.2014.92>
- Grammont, Hubert Carton de. 2008. "El concepto de nueva ruralidad." In Edelmira Pérez, María Adelaida Farah, and Hubert de Carton Grammont, eds., *La nueva ruralidad en América Latina: Avances Teóricos y Evidencias Empíricas*, pp. 23-44. Pontificia Universidad Javeriana.
- Gil-Méndez, Jesús. 2015. "Neoliberalismo, políticas agrarias y migración. Consecuencias de un modelo contra los productores." *Ra Ximhai*, 11 (2): 145-162.
- Gómez-Pellón, José Eloy. 2015. "Aspectos teóricos de las nuevas ruralidades latinoamericanas." *Gazeta De Antropología*, 31 (1): artículo 11, 1-15. <http://dx.doi.org/10.30827/Digibug.36669>
- González-Estrada, Adrián. 2016. "Industrialización y transnacionalización de la agricultura mexicana." *Revista Mexicana De Ciencias Agrícolas*, 7 (3): 693-707. <https://doi.org/10.29312/remexca.v7i3.328>
- Hall, Peter A. and Rosemary CR Taylor. 1998. "The Potential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 Response to Hay and Wincott." *Political Studies*, 46 (5):

- 958-962. <https://doi.org/10.1111/1467-9248.00178>
- Hall, Colin Michael. 2008. *Tourism Planning Policies, Processes and Relationships*. Pearson Education.
- Harvey, David. 2007.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Immergut, Ellen M. 1998.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 Society*, 26 (1): 5-34. <https://doi.org/10.1177/0032329298026001002>
- Ita, Ana de. 2006. "Land Concentration in Mexico After PROCEDURE." In Peter Rosset, Raj Patel, and Michael Courville, eds., *Promised Land: Competing Visions of Agrarian Reform*, pp. 148-164. Food First Books Oakland, California.
- INEGI. 2010. "Principales resultados del censo de población y vivienda 2010." https://www.inegi.org.mx/contenidos/productos/prod_serv/contenidos/espanol/bvinegi/productos/censos/poblacion/2010/princi_result/qroo/23_principales_resultados_cpv2010.pdf (April 13, 2025).
- Izard, Oriol Miralbell, Ramon Arcarons i Simon, Josep Capellà i Hereu, Francesc González Reverté, and Jasep Maria Pallás i de Pineda. 2010. *Gestión pública del turismo*. Univesitat Oberta de Catalunya: Barcelona.
- Jenkins, Carson and B. M. Henry 1982.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Touris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9 (4): 499-521. [https://doi.org/10.1016/0160-7383\(82\)90070-6](https://doi.org/10.1016/0160-7383(82)90070-6)
- Klein, Emilio. 1993. "El mundo del trabajo rural." *Nueva Sociedad*, 124: 72-81.
- Kubickova, Marketa. 2016.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ourism: Linking Competitiveness, Freedom,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Czech Journal of Tourism*, 5 (2): 73-92. <http://dx.doi.org/10.1515/cjot-2016-0005>
- Lara, Delfina Ortiz. 2018. "La élite local y su apropiación del Programa Pueblos Mágicos." *Revista de Estudios Urbanos y Ciencias Sociales*, 8 (2): 107-120.
- Lemke, Thomas. 2001.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Michel Foucault's Lecture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on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Economy and Society*, 30 (2): 190-207.

- Levi, Liliana López. 2018. "Las territorialidades del turismo: el caso de los Pueblos Mágicos en México." *Ateliê Geográfico*, 12 (1): 6-24. <https://doi.org/10.5216/ag.v12i1.45803>
- López, José de Jesús Hernández. 2009. "Tequila: centro mágico, pueblo tradicional. ¿Patrimonialización o privatización?" *Andamios*, 6 (12): 41-67. <http://dx.doi.org/10.29092/uacm.v6i12.134>
- Macías, Alejandro Macías. 2013. "Introducción. Los pequeños productores agrícolas en México." *Carta Económica Regional*, 111: 7-18. <https://doi.org/10.32870/cer.v0i111%20-%20112.5490>
- Mahoney, James. 2001. "Path-Dependent Explanations of Regime Change: Central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6 (1): 111-141. <http://dx.doi.org/10.1007/BF02687587>
- March, James G. and Johan P. Olsen. 1984.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8 (3): 734-749.
- Martínez, Alfonso Jiménez. 1993. *Turismo: estructura y desarrollo*. México, McGraw Hill.
- Mateos, Jimena. 2006. "El turismo en México: la ruta institucional (1921-2006)." *Patrimonio Cultural y Turismo, Cuadernos*, 14: 34-43.
- Mendoza, Martha Garduño, Celia Guzmán Hernández, and Lilia Zizumbo Villarreal. 2009. "Turismo Rural: Participación de las comunidades y programas federales." *El Periplo Sustentable*, 17: 5-30.
- Morales-Moreno, Isidro. 2008. "Managing the Challenges of WTO Participation: Case Study 28 Mexico's Agricultural Trade Policies: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and Domestic Pressure." *Análisis Económico*, 23 (53): 315-328.
- Morett-Sánchez, J. Carlos, and Celsa Cosío-Ruiz. 2017. "Panorama de los ejidos y comunidades agrarias en México." *Agricultura, Sociedad y Desarrollo*, 14 (1): 125-152. <http://dx.doi.org/10.22231/asyd.v14i1.526>
- Muratalla-Lúa, A., Contreras, J., and Arévalo, L. 2013. "La producción de

- frambuesa y zarzamora en México.” *Agro Productividad*, 6 (5): 3-12.
- Muñoz, Alejandro Palqjox, and Alejandro Alvrtdmo Herrera. 2005. “La promoción del turismo en México: repitiendo esquemas.” In Alejandro Palqjox Muñoz, ed., *Turismo: Teoría y Praxis*, pp. 205-217. Plaza y Valdés.
-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ierson, Paul. 2000. “Not Just What, But When: Timing and Sequence in Political Processes.”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14 (1): 72-92. <https://doi.org/10.1017/S0898588X00003011>
- O’Toole, Gavin. 2003. “A New Nationalism for a New Era: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Mexican Neoliberalism.”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22 (3): 269-290. <https://doi.org/10.1111/1470-9856.00078>
- Quintana, Claudio. 2016. “Política pública de turismo en Uruguay (1986-2010).” *Revista de Turismo y Patrimonio Cultural*, 14 (3): 725-736. <https://doi.org/10.25145/j.pasos.2016.14.047>
- Ramírez-Juárez, Javier. 2022. “Seguridad alimentaria y la agricultura familiar en México.” *Revista Mexicana de Ciencias Agrícolas*, 13 (3): 553-565. <https://doi.org/10.29312/remexca.v13i3.2854>
- Rascón, Cristina Martínez. 2013. “Pueblos mágicos y nuevas ruralidades. El caso de Álamos, Sonora.” *Diálogos Latinoamericanos*, 14 (21): 31-45. <https://doi.org/10.7146/dl.v14i21.113252>
- Repetto, Francisco Fernández, and Mariana Guevara Rosado. 2021. “Local Ag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ourist Image of the Magical Town of Izamal: Producers or Reproducers?” *LiminaR*, 19 (2): 164-187.
- Sanders, David. 2002. “Behaviouralism.” In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 eds.,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pp. 45-64.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 SAGARPA and Organiza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 para la Alimentación y la Agricultura (FAO). 2012. “Diagnóstico del sector rural y pesquero:

- Identificación de la problemática del sector agropecuario y pesquero de México.” <https://www.fao.org/3/bc980s/bc980s.pdf> (April 13, 2025).
- Secretaría de Turismo. 2014. “Guía de incorporación y permanencia Pueblos Mágicos.” <https://www.sectur.gob.mx/wp-content/uploads/2014/10/GUIA-FINAL.pdf> (April 13, 2025).
- Steinmo, Sven,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1992.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ory, Dale. 1982. “Trade Politics in the Third World: A Case Study of Mexican GATT Decis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 (4): 767-794. <https://doi.org/10.1017/S0020818300019093>

